

全球智库半月谈

数字经济下税收的趋势和挑战

央行需要新的措施来应对下一个衰退

制造业就业、国际贸易与中国

中国与欧盟的经济关系

中美贸易协定将带来哪些溢出效应

生男生女与农村劳动力供给

金融全球化的总量与分配效应

本期编译

李芳菲

李陆屿

史明睿

宋海锐

吴泓蓁

杨茜

伊林甸甸

张舜栋

张子萱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承担的编译项目，每半月定期发布。所有稿件均系网络公开文章，由项目组成员依据当前热点编译组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组

顾问	张宇燕			
首席专家	张 斌		姚枝仲	
团队成员	曹永福	美国经济	陆 婷	欧洲经济
	冯维江	日本经济	熊爱宗	新兴市场
	徐奇渊	中国经济	杨盼盼	东盟与韩国
	肖立晟	国际金融	李远芳	国际金融
	常殊昱	跨境资本流动	顾 弦	大宗商品
	陈 博	大宗商品	吴海英	对外贸易
	崔晓敏	对外贸易	熊婉婷	金融政策
	王 地	宏观经济	张寒堤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 长	张宇燕			
召集人	徐 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 峰	国际战略	徐 进	国际安全
	薛 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 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 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 薛懿 邮箱: xueyi1800@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4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数字经济下税收的趋势和挑战 6

导读：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领先者。尽管有希望，全球数字经济也面临许多挑战，包括基本税收侵蚀和利润转移等。鉴于中国为应对这些挑战所做的初步努力，该文章建议中国继续参加国际税收论坛，采取积极措施，改善其税务审计制度，并增强其税收管理能力。

随着 libra 的崛起，中央银行该如何管理数字货币 9

导读：最近，加拿大央行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它绕过传统媒体和自有网站，在推特上澄清了自身对加密货币的态度。它表示：“鉴于技术进步以及银行票据为加拿大人提供重要公共服务，我们目前在央行数字货币方面的工作仍是探索性的。”

央行需要新的措施来应对下一个衰退 12

导读：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处于或接近历史低点的情况下，各国央行在应对衰退时是否已经弹尽粮绝，还有其他工具吗？本文认为，各国央行在应对经济衰退方面的空间比起初看起来更大，但各国都有不同的重要限制。

制造业就业、国际贸易与中国 14

导读：制造业的衰退与就业规模的减少困扰着许多发达国家。而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现有的产业结构也正经历变革。利用国际数据，作者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影响各国制造业就业规模的因素，并给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与欧盟的经济关系 32

导读：中国与欧盟有着广泛且不断深化的经济关系。但是，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扭曲，另一方面由于欧盟的联盟不完整造成其内部存在多种利益诉求，中欧关系存在问题。双方之间存在尚未开发的贸易和投资机会，有很多行动都可以抓住这些机会。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活力，再加上最近从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向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的转变，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机会可能越来越多。

中美贸易协定将带来哪些溢出效应？ 56

导读：中美旷日持久的贸易战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两国能否最终达成协议？达成协议后，第三国将会受到怎样的冲击？IMF 的多名经济学家对可能达成的贸易协定做了综合分析，并计算了协议在短期内可能带来的溢出效应。

聚焦中国

中国经济被夸大了吗？不应以增值税增长率为依据 69

导读：布鲁金斯学会曾有论文依据中国增值税增速与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差距，判定官方公布的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存在夸大，夸大的原因是地方官员报告过高。但本文认为，增值税增长率需考虑对机械设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值税减免部分，因此原论文依据存在问题。

生男生女与农村劳动力供给 72

导读：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妇女在生完女儿之后的一年中劳动力供应下降，此后逐渐恢复至女儿出生前的劳动力供给水平；而生育儿子带来的农村妇女劳动力供给负面影响则更大，持续时间也将比生育女儿更多四年。

战略观察

金融全球化的总量与分配效应 75

导读：近几十年间的贸易自由使新兴市场国家的国民收入同工业化国家间的差距持续缩小，然而我们目前尚不清楚金融国际化是否也能起到类似作用。本研究表明，在实现金融国际化的条件下，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收入增幅较小，但收入贫富差距加剧，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也明显下降。相较于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更难权衡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这也是为了实现全球化包容性大家所须探讨的核心。

本期智库介绍 78

数字经济下税收的趋势和挑战

Akiko Terada-Hagiwara/文 吴泓慕/编译

导读：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领先者。尽管有希望，全球数字经济也面临许多挑战，包括基本税收侵蚀和利润转移等。鉴于中国为应对这些挑战所做的初步努力，该文章建议中国继续参加国际税收论坛，采取积极措施，改善其税务审计制度，并增强其税收管理能力。编译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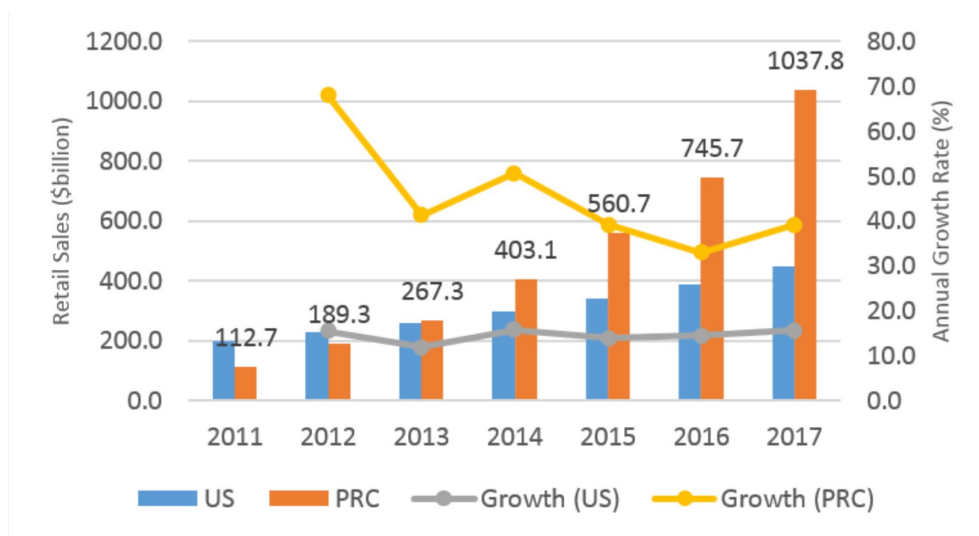
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迅速。2018年《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见注1）显示，新西兰，冰岛和大韩民国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采用数字技术的表现最佳，而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PRC），正在迅速追赶。

尽管如此，全球数字经济也呈现出了许多挑战，其中包括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对BEPS进行了深入讨论，但解决方案尚未出现。实际上，一些在数字经济的中关键特征会加剧BEPS的风险。这些功能包括流动性、对数据的依赖、网络效应、多边商业模式的传播、垄断或寡头化的趋势以及波动性（经合组织，2015年BEPS行动1）。常规税收系统通常依赖实体公司的“实体在”，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并不相关。

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

2017年，中国是最大的电子商务零售市场，销售额是美国的两倍以上，是2011年的近10倍（图1）。在移动支付方面，用户数量和交易量都是世界上最高，并且增长很快。同时，中国的跨境电子商务也一直在稳定增长。此外，中国还位列关键技术（包括金融科技，自动驾驶，3D打印和人工智能）的风险投资的全球三大目的地（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7年）。

图1 中国与美国的电子商务零售额



PRC =中国 US=美国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就市值而言，中国的“四大”公司—京东，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BAT）—跻身全球十大公司之列。2016年，为消费者服务的总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这表明中国已经是电子商务和数字支付的全球领导者。而主导参与者因交易类型而不同。

近年来，企业对客户（B2C）市场在中国的电子商务领域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这种趋势反映了中国的宽松政策和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喜好。从2012年到2016年，中国的B2C电子商务销售额增长了一倍以上，可能是由于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使个人就可以注册为销售商品的卖家。（Terada-Hagiwara, Gonzales 和 Wang, 2019年）

在城市地区，无现金支付正通过腾讯控股的微信和阿里巴巴集团的支付宝等平台逐渐成为常态。但是，存在城乡差距：农村地区的互联网用户仍然有限。截至2017年12月，城市互联网用户达到5.63亿，而农村地区仅为2.09亿。在北京，广东和上海等地区，使用量增长强劲，而贵州、西藏和云南等省则落后（Herrero 和 Xu, 2018）。

数字经济的举措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从对抗BEPS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的建议举措无法与其他举措区分开，因为经济的数字化不会单独引发的BEPS问题。因此，为了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都需要对诸如转让定价规则的修订，常设机构的变更以及受控外国公司规则之类的措施进行评估。对于联系，数据和收入表征的更广泛挑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了“重要的经济存在”的新概念，以替代当前的常设机构规则。经合组织还建议对数字交易征收预扣税，并引入“均衡征税”（经合组织的BEPS行动1，2015年）。

对于跨境交易，经合组织（2018）报告称，已有110个经济体同意在2020年之前就如何跨境对数字业务征税达成国际共识。这些经济体已经同意审查不适合数字经济的旧的或传统的税制。尽管这些建议的选择是迈向对数字经济征税的国际标准的良好起点，但细节尚待开发和定案。

同时，各国已采取单方面措施。这些没有得到协调，它们的内容和时间表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共有以下几个方面：1）它们旨在通过国内或区域法律来实施，而不是依靠国际合作；2）他们旨在维护或扩大通常由跨国公司进行的在线商业活动的来源税；3）它们借鉴了经合组织最初为国际标准提议的上述选择的某些要素（见注2）。

在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一些国家已采取措施来扩大预提税的范围或引入新的流转税。但是，主要用来响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工具是通过增值税（VAT）设置的。例如，东南亚的经济体认识到电子商务税收的重要性，以便利

用增长并平衡在线业务与离线业务之间的竞争环境。但是，他们的行为仅限在对各种交易征收增值税。

对于中国，Terada-Hagiwara, Gonzales 和 Wang（2019）确定了四个政策行动领域。它们是：1）继续参加国际税收论坛；2）采取单方面措施；3）完善税务登记制度，以解决未征税的消费者与消费者交易；4）加强和提高税收征管能力。第三点，中国是对许多金融服务和房地产交易应用增值税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尽管如此，问题仍然存在，比如在税收收集的效率和有效性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例如，中国于 2016 年取消了跨境电子商务进口免征增值税的门槛，这意味着即使税收收入低于征收成本，小额交易也要征税。这也激发了更多研究的潜力。

注 1：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DESI）是一个综合指数，显示了五个主要维度的加权平均值，即连通性、人力资本、互联网使用、数字技术集成和数字公共服务。DESI 汇总了有关数字性能的相关指标，并跟踪了数字竞争力的发展（请参阅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desi>）。

注 2：《OECD-G20 BEPS 中期报告 2018》（OECD 2018）还包括第四组，“针对大型跨国企业的特定制度”。本政策简报将其排除在外，因为尽管制度广泛相关，但并非专门针对数字化。

本文原题为“Taxation Trends and Challenges in a Digital Economy — Implications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本文作者 Akiko Terada-Hagiwara 为 VoxChina 网站分析专家。本文于 2019 年 9 月刊于 VoxChina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随着 libra 的崛起，中央银行该如何管理数字货币

Kevin Carmichael/文 宋海锐/编译

导读：最近，加拿大央行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它绕过传统媒体和自有网站，在推特上澄清了自身对加密货币的态度。它表示：“鉴于技术进步以及银行票据为加拿大人提供重要公共服务，我们目前在央行数字货币方面的工作仍是探索性的。”编译如下：

最近，一本名为《逻辑学》的书在加拿大引起了争议，该书是一本涵盖加拿大科技产业的数字出版物。作者在书中写道，他通过加拿大《信息获取法》获得的一份有关数字货币的一年报告显示，“加拿大银行正在考虑推出一种数字货币，以帮助银行对抗加密货币的‘直接威胁’，也可以收集更多关于人们如何花钱的信息。”

但是加拿大央行对此表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官方在推特中表示：“鉴于技术进步以及银行票据为加拿大人提供重要公共服务，我们目前在（央行数字货币）方面的工作仍是探索性的。”同时它在另一份报告中补充道，“任何潜在的（数字货币）系统都需要政府的支持，它必须像任何其他支付服务提供商那样遵守加拿大的隐私法”。

《逻辑学》这本书是由金融邮报发表的，并引起了前保守党议员马克西姆·伯尼尔的注意，他去年创建了自己的政党。（伯尼尔在 10 月 21 日失去了议会席位，他的加拿大人民党仅仅赢得了 1790 万张选票中的 1.6%。）伯尼尔在推特上说，“我曾撰文讨论过央行如何不断降低我们的货币币值。现在它正在探索一种数字货币来取代现金，并允许政府监视我们。这根本不是所谓的阴谋论，而完全是公开计划的。”

加拿大央行的推文则表示，它正在调整其沟通策略。它选择对这篇关于数字货币的文章作出回应，是因为这篇文章发表在《逻辑学》的读者以及其他对加密资产感兴趣的人最有可能看到的平台上。更重要的是，加拿大央行认为有必要对此做出回应。

Facebook 希望创造一种可与美元、欧元、日元等一样用作交换单位的数字资产，这将使支付的未来成为主流政策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敏感问题，因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可能尚未做好准备。

上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和资本市场部主管——托比亚斯·阿德里安对彭博新闻社表示，“新技术有可能相当迅速地催生一个新的全球支付系统，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大规模的混乱出现只是时间问题。”

2014 年 11 月，加拿大央行高级副行长卡罗琳·威尔金斯曾就数字货币问题发表了央行领导人的首次讲话。威尔金斯站在了国际金融领域重大事件的前沿。比

特币和各种金融科技公司的颠覆性潜力才刚刚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加拿大央行就已经开始研究数字创新可能如何改变金融体系及其实施货币政策的能力。今年5月，加拿大央行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实验，两家机构用各自的数字货币完成了跨境支付。

今年6月，Facebook宣布计划创造一种全球性的“稳定资产”——它的价值与另一种资产（如黄金或现有货币）挂钩以减少波动性，预计到2020年超过20亿的平台用户将可以使用这种资产。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白宫和国会都对这一消息作出了负面回应，这促使包括万事达信用卡公司和维萨公司在内的Facebook部分原始合作伙伴退出了这一项目。上个月，七国集团的一个工作组发布报告称，Facebook所谓的全球性“稳定资产”的落地存在不确定性，“这种货币面临重大的法律、监管和运营挑战，同时也可能损害那些为保护消费者数据、遏制避税行为、促进竞争、维护金融稳定而做出的努力。”。

10月15日，总部位于日内瓦、负责监督Facebook拟议货币Libra的机构正式成立，该机构共有21名成员，其新闻稿称，已有1500多家“实体”单位表示有意加入。10月16日，当被问及提供金融服务的科技公司是否应该面临与银行同样的限制时，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顿表示，“同样的风险，同样的规则”。

Facebook之所以能强制发行Libra，是因为它有足够的现金储备来抵御一段时间的监管不确定性。但也正是由于政府和传统金融未能建立起一个普遍的金融体系，它的地位才得到了加强。虽然全球化加速了商业发展，移动技术几乎连接一切，但支付系统仍与几十年前一样。这导致数亿人无法进入银行系统，同时收费和漫长的传输时间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

G7和其他国家多年来一直在谈论如何在金融包容方面有所作为，而Facebook恰巧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监管者减缓Libra发展进程或许是正确的，但如果不提出其他解决方案，监管将缺乏道德权威，最终无法坚持太久。

10月30日，在渥太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威尔金斯说道：“值得关注的是，在支付系统效率低下且很多人无法进入系统的情况下，我们将如何发展。这就要求各国央行、主要参与者和国际网络尽快采取行动，以解决这些问题。”

威尔金斯说，2020年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和其他国家将优先制定稳定货币的政策。上个月七国集团的报告还建议各国央行加快创建本国数字货币的工作。

本文原题为“With Facebook’s Libra on the Horizon, How Will Central Banks Approach Digital Currency?”。本文作者 Kevin Carmichael 是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英国《金融邮报》的国家商业专栏作家。本文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发表于 G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央行需要新的措施来应对下一个衰退

Joseph E. Gagnon 和 Christopher G. Collins /文 杨茜/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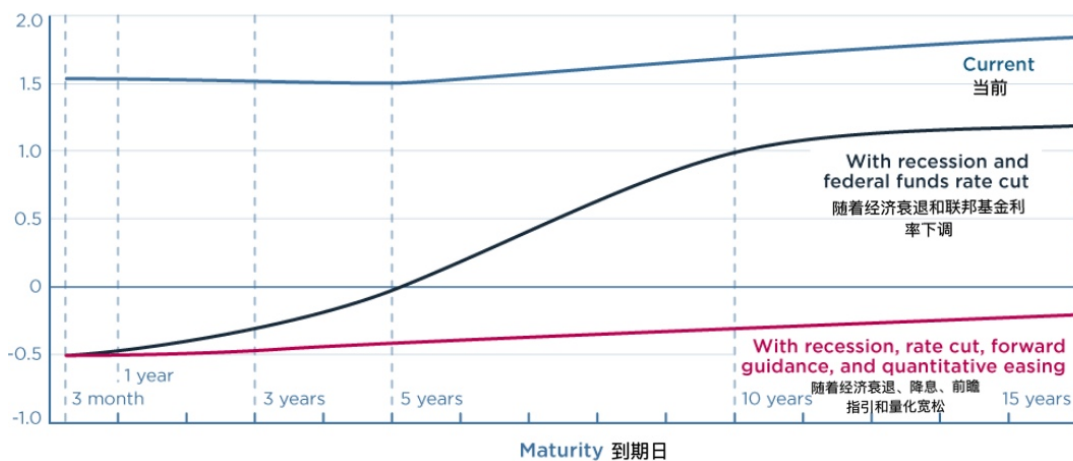
导读：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处于或接近历史低点的情况下，各国央行在应对衰退时是否已经弹尽粮绝，还有其他工具吗？本文认为，各国央行在应对经济衰退方面的空间比起初看起来更大，但各国都有不同的重要限制。编译如下：

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处于或接近历史低点的情况下，各国央行在应对衰退时是否已经弹尽粮绝，还有其他工具吗？我们最近发布的PIIE政策简报认为，各国央行在应对经济衰退方面的空间比起初看起来更大，但各国都有不同的重要限制。

首先，美联储有足够的空间降低短期和长期利率（通过量化宽松），以应对温和的经济衰退。美联储可以将联邦基金利率从目前的1.6%下调约2.1个百分点至-0.5%。如图所示，这样做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长期利率（深蓝线），而在前瞻指引和量化宽松政策下，这些指标将进一步下调至其下限（红线）。根据美联储委员会的FRB/US模型，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下降1个百分点，将产生类似于联邦基金利率下调2.5个百分点的刺激举措。因此，美联储的剩余弹药总量相当于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2个百分点。美联储通过降息5.2%至5.5个百分点应对1990年和2001年的温和衰退。

图 1 美联储需要将降息与前瞻指引和量化宽松结合起来，以进一步降低债券收益率

US government bond yields, percent 美国政府债券收益率 (%)



第二，即使是在应对温和衰退时，美联储也需要使用负利率。利率不能有效地降至-0.5%以下，但这一利率水平已经足够产生强大的力量，因为它为扩大量化宽松政策并将债券收益率推至零以下开辟了空间。如果市场认为央行永远不会将其政策利率设定在零以下，那么债券收益率就不能低于零。因此，将下限设定为0而不是-0.5，将使美联储的“弹药”量减少约1.2个百分点的联邦基金利率，

而使“弹药”仅剩 4 个百分点。

第三，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银行没有进一步降低短期和长期利率的巨大空间。但是它们确实还有其他强大而有争议的工具（美联储缺乏这些工具）。这些工具包括大规模购买股票和向家庭转移现金。

第四，当经济陷入衰退时，试图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目标或采取“补偿”策略提高通货膨胀预期可能并不可信。（补偿策略是承诺在通货膨胀率低于预期时超额完成通胀目标，或者将政策利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而在利率受下限限制后的更长时期内保持不变。）但如果在下一次衰退开始之前能够实现较高的通胀率，这将大大增加中央银行的“弹药”量。长期通货膨胀预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中央银行的“弹药”就会增加约 2.5 个百分点的降息空间（因为这增加了量化宽松的操作空间）。

本文原题为“Central Banks Probably Need Extraordinary Measures to Fight the Next Recession”。本文作者 Joseph E. Gagnon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高级研究员，Christopher G. Collins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研究分析师。本文于 2019 年 12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制造业就业、国际贸易与中国

Abdelaaziz AIT ALI, Uri DADUSH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制造业的衰退与就业规模的减少困扰着许多发达国家。而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现有的产业结构也正经历变革。利用国际数据，作者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影响各国制造业就业规模的因素，并给出了政策建议。编译如下：

1. 引言

对几乎所有国家来说，制造业就业的萎缩都是时下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研究表明，制造业就业的衰退是不平等程度加剧和社会矛盾频发的主要诱因（Grabowski, 2017, Autor, 2016）。随着近年来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兴起，制造业就业的话题引起了各界更广泛的关注。

与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同，从全球视角来看，制造业绝非是一个萧条的行业。据笔者测算，自 2000 年以来，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快速增长，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也依然如此。尽管发达国家对制造业的需求增长缓慢，但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的需求为全球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不过，与快速增加的产值相比，全球制造业的雇佣规模却增长缓慢，这一现象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就国家来看，过去几十年间，世界制造业就业的增长大多产生于中国。而对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来说，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其制造业就业占社会总就业的比重都有所减少。另外，对几乎所有发达国家而言，其制造业就业的绝对规模在过去二十年间都经历了下滑——事实上，平均而言，制造业仅贡献了全球平均非农就业增加值的 10%。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造就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也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变了国内的就业结构——几十年间，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了制造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导致了其他国家制造业就业的萎缩。事实上，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内需迅速扩大，大量中国制造的工业品最终都流向了中国的国内市场。根据我们的研究，以工业自动化为代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绝大多数国家制造业就业萎缩的直接原因。在之前的文献中（Edwards and Lawrence, 2013），也有学者证实过这一观点。

受赶超效应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速甚至要高于发达国家。因此，不少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就业的增长速度也相对缓慢。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尽管人均收入依然较低，但其制造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已经达到了峰值，再难进一步上升，这种现象被学者概括为“过早的去工业化”（Rodrik, 2015）。

受数据所限，我们目前还难以精确地衡量制造业就业萎缩对经济的综合影响。比方说，许多企业虽然通常被视为制造业企业（如制药公司），但真正的生产制

造部门往往只占其公司产值的一小部分，而占大头的销售、研发等部门尽管在数据中也被归为制造业的一部分，但其具体业务却具备更多服务业的特征。

（Dadush,2015）此外，一些企业尽管在统计数据中被归为服务业的一部分，但其实质上是制造业企业的直接延伸（如汽车修理厂、4S 店等）。虽然他们不直接制造工业品，但他们也应当被归于制造业当中。除了数据定义的问题，广泛存在的企业间外包行为也增加了我们研究制造业就业的难度。近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选择将各种业务外包给外部的服务业企业，这对制造业就业规模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在具体分析数据时，制造业与服务业企业的界线往往并非泾渭分明。在本文中，笔者使用多种不同的定义方式，试图检验制造业部门规模是否能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速。尽管难以得到明确的普适性结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尽管一些国家经历了制造业就业比例的相对下降，但他们依然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当然，如果他们当初采取了促进制造业就业扩张的政策，他们的经济表现或许还能更好些。另外，在本文中笔者还描述了全球制造业产值及就业规模的变化趋势，并以四个典型国家为例做了案例研究。最后，笔者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2. 制造业的全球图景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WIOD；数据更新至 2014 年），我们计算了劳动生产率、国内需求及国际需求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在数据允许的前提下，我们以金融危机为界，将数据分为 2001-2008 和 2008-2014 两个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主要目的仅仅是对制造业就业的直接影响因素做出度量，而非追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如人口结构、商业周期、监管政策等。

在度量制造业就业时，我们依赖一条基本原则——即制造业产出等于内需加制造业的贸易盈余（出口减进口）。其中，内需既包括市场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也包括对中间品的需求。在实际测算中，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难点在于如何合理地定义制造业企业，并为各年各部门的名义价格找到合适的平减指数。另外，我们假设需求的结构不影响对应的劳动投入，即无论每一美元的总需求中有多少比例属于中间品内需、最终品内需或外需，其背后要求投入的劳动力规模在同一时点是不变的。

根据国际劳工办公室（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的统计，截至 2014 年，全球制造业总计提供了超过 4.66 亿个工作岗位，与 2001 年相比增加了 6300 万个。在危机以前，全球制造业就业的年均增速为 1.3%。受危机影响，这一数字在 2008 年后有所回落，但依然达到了年均 1% 的水平。在表 1 中，笔者列出了各影

响因素对制造业就业增速的贡献程度。

表 1 各要素对制造业就业的贡献：全球均值

Contribution to employment change in percentage points* 以百分点计算					
时期 Periods	劳动生产率 Productivity	国内需求（最终品） Domestic final demand	国内需求（中间品） Sectoral trade	国际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	全球平均制造业就业增速 Average employment growth rate
2001-2008	-6.3%	9.4%	-1.8%	0.0%	1.3%
2008-2014	-3.7%	5.7%	-1.0%	0.0%	1.0%

*the sum of productivity, Domestic Final demand, sector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ontributions equals to employment change.
注：总效应（最后一列）等于各分项效应之和

Contribution to employment change in thousands of employees** 以绝对数计算					
时期 Periods	劳动生产率 Productivity	国内需求（最终品） Domestic final demand	国内需求（中间品） Sectoral trade	国际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	全球平均制造业就业增速 Employment change *
2001-2008	-185 098.6	274281.8	-52281.7	0.0	36901.5
2008-2014	-99 258.0	153305.7	-27469.4	0.0	26578.4

**the sum of productivity, Domestic Final demand, sector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ontributions equals to employment change.
注：总效应（最后一列）等于各分项效应之和

如表 1 所示，从全球均值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对制造业就业的贡献恒等于零。这是因为，贸易只会导致制造业就业在国家间发生转移，而不会对全球总就业水平有所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在危机前，制造业增加值（即表 1 中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水平增速的绝对值之和）的增长速度非常高，达到年均 7.6%；而在危机后，这一数字仅为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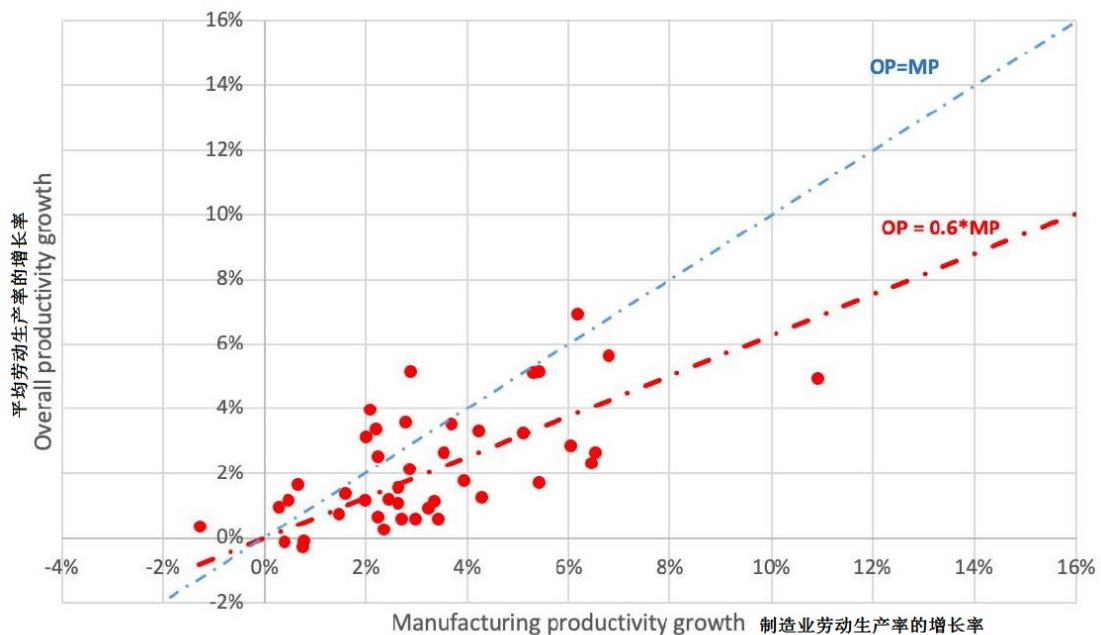
对制造业的就业增长来说，国内需求（包括私人部门消费、投资及政府采购）是最为重要的贡献因素。相比之下，部门间贸易（即其他部门对制造业的净需求）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为负，这反映了外包行为给制造业就业带来的流失效应。此外，在产出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使得制造业雇佣规模大幅下降。数据显示，无论是在危机前还是在危机后，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均维持在较高水平，分别为 6.3% 和 3.7%。

从工业增加值的角度来看，尽管金融危机对制造业和国际贸易造成了较大影响，但 2008 年以来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依然大于平均 GDP 增速，这意味着制造业生产的最终产品更多流向了各国的国内市场。有趣的是，从纯粹会计核算的角度来说，假如 2001-2014 年间没有任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么全球制造业将多雇佣 2.74 亿人，相当于实际情况的 7 倍。尽管这种计算方法存在缺陷，但这无疑反映出了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

与其他行业相比，制造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为了回

答这一问题，我们使用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和国际劳工办公室（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数据，对各国情况做出汇总分析。考虑到大国的数据质量相对较高，我们在以下分析中主要关注那些在 2001 年制造业就业超过 100 万人的经济体。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共选中了 43 个经济体，覆盖了全球 91% 的制造业工作岗位。

图 1 各国制造业与全行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对比



*The 0.6 coefficient is significant at 1% level. 该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

如图 1 所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与全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另外，与制造业相比，平均而言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要低 40% 左右。在所有 43 个国家中，仅有 11 个国家的其他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速超过了制造业——这些国家基本是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国、印尼、泰国、孟加拉和越南等。我们通常认为，对于这些经济增长的“明星国家”来说，制造业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但这个发现意味着，制造业仅仅是这些国家各个蓬勃发展的行业中的一员。与制造业一样，这些国家其他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也经历了飞速进步。

3. 各国制造业就业趋势的异质性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在 2013 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自世纪之交以来，世界大多数新增的制造业岗位都分布在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一些学者认为，与上世纪的经验相比，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倾向于更早地到达制造业占比的顶峰（包括制造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以及制造业就业占社会总就业的比重），并随之开始制造业的停滞乃至萎缩，这反映出了技术进步和扩散速度的提升（见 Lawrence, 2018；Rodrik, 2015）。这就是著名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观察国别历史数据我们会发现，美国历史上制造业就业占比的顶峰出现于 1953 年，达到 25%；英国出现在 1961 年，为 32%。相比之下，尽管人均收入尚未达到英美水平，但中国、南非、巴西等国似乎已经经历了制造业就业占比的巅峰期，且其顶峰时期的就业占比也仅为 15-19% 左右（Lawrence, 2018）。

笔者基本认同上述论断，但在此希望做三点补充：首先，尽管发达国家制造业需求增长乏力，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对制造业需求的增速依然高于同期 GDP 增速；其次，如前文所述，在一些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其各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速并不低于制造业水平；最后，随着过去二十年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在制造业具备突出比较优势的国家获得了迅速增长，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但是，正如 Lawrence（2019）所指出的，即便是中国似乎也已经过了制造业的顶峰时期，更不要说其他发展中国家了。

笔者在表 2 中列举了 43 个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就业规模的变化情况。我们发现，在 2001 至 2014 年间，全球超过半数的新增制造业就业岗位出现于中国。除中国外，另一个表现突出的国家是印度。基于测算，共有 17 个经济体的制造业就业相对占比出现了 3 个百分点以上的变动（见表中标蓝的部分）——其中，大幅增长的经济体仅有 3 个，而剩下 14 个经济体则纷纷经历了制造业就业相对占比的大幅下滑，这其中甚至包括日本和德国这样的传统制造业大国。

表 2 各国制造业就业变化情况

国家 Country		制造业岗位变化（绝对数，千人） change in Thousands	制造业岗位变化（百分比） change in %	制造业就业占全社会总就业比例的变化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share
China	中国	32 294.08	22.0	3.1
India	印度	13 529.03	31.2	1.2
Bangladesh	孟加拉国	4 472.36	116.9	5.6
Viet Nam	越南	3 829.84	94.1	4.7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3 486.44	28.2	0.2
Pakistan	巴基斯坦	2 888.78	48.7	0.3
Brazil	巴西	1 887.17	18.6	-1.1
Turkey	土耳其	1 603.36	48.5	2.4
Thailand	泰国	1 547.17	31.2	2.6
Mexico	墨西哥	804.65	10.6	-3.0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795.48	51.4	-0.1
Colombia	哥伦比亚	708.25	33.4	-0.7
Egypt	埃及	701.75	30.8	-0.9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伊朗	526.40	16.3	-1.5
Philippines	菲律宾	522.20	18.1	-1.4
Myanmar	缅甸	518.16	24.6	1.4
Argentina	阿根廷	416.03	21.4	-0.7
Taiwan, China	中国台湾省	395.77	16.4	-0.6
Peru	秘鲁	383.20	33.1	-0.7
Poland	波兰	320.00	11.0	-1.0
Venezuela, Bolivarian Republic of	委内瑞拉	297.50	25.4	-1.4
Sri Lanka	斯里兰卡	234.80	19.1	1.4
Malaysia	马来西亚	198.19	9.0	-6.2
Nigeria	尼日利亚	195.48	5.0	-2.5
Morocco	摩洛哥	43.96	4.1	-2.0
Czech Republic	捷克	8.87	0.7	-1.4
Korea, Republic of	韩国	-20.25	-0.5	-2.8
Australia	澳大利亚	-42.75	-4.1	-2.9
Korea,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朝鲜	-68.50	-3.1	-2.4
South Africa	南非	-83.37	-4.4	-4.0
Netherlands	荷兰	-331.99	-28.4	-4.3
Romania	罗马尼亚	-348.38	-17.9	0.2
Portugal	葡萄牙	-357.51	-32.4	-4.9
Canada	加拿大	-515.64	-22.7	-5.3
Ukraine	乌克兰	-545.57	-18.2	-1.9
Germany	德国	-743.18	-8.5	-4.0
Italy	意大利	-837.52	-17.2	-4.2
Spain	西班牙	-941.62	-30.3	-6.4
France	法国	-1 371.65	-29.3	-6.3
United Kingdom	英国	-1 454.16	-32.0	-6.4
Japan	日本	-2 086.66	-16.0	-3.2
Russian Federation	俄罗斯	-2 841.20	-21.5	-5.6
United States	美国	-3 863.97	-19.1	-3.4
Total	合计	56 155.0	0.2	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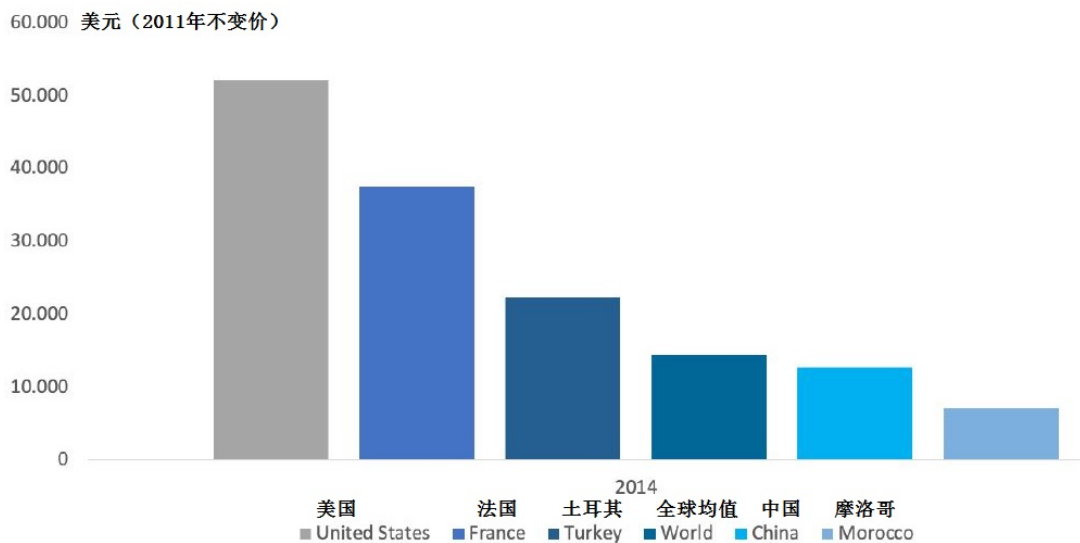
在这些国家中，制造业就业相对占比出现净增长的国家仅有 10 个，而增长超过 2 个百分点的国家则有五个，分别为：中国、孟加拉国、越南、泰国和土耳其。其中，孟加拉和越南的增长分别高达 5.6 和 4.7 个百分点。在非洲，表现最突出的国家是埃塞俄比亚，其制造业新增了超过 80 万个就业岗位，而埃塞俄比亚也逐渐成为非洲著名的制造业新星。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摩洛哥是为数不多制造业就业相对占比下降的国家。

在发达国家，政策制定者们往往认为制造业能给新增劳动力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而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则普遍认为制造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部门。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数据显示或许并非如此。根据国际劳工办公（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ILO）统计，2001 至 2014 年间全球共净新增 4.92 亿个工作岗位，其中仅有 6300 万个位于制造业部门。服务业贡献了超过 73% 的新增就业，非制造业的工业部门（如建筑等）贡献了 17%，而制造业仅贡献了 10% 左右。换言之，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制造业并不是为新增劳动力提供工作岗位的首要来源，即便是在孟加拉和越南这样的国家也是如此。

4. 国别案例

为了更好地了解制造业就业的变迁趋势，我们以下关注几个具体国家的案例。在图 2 中，我们考察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五个国家——我们的样本既包括法国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包含中国和土耳其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此外，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例，我们也将摩洛哥纳入了考察范围。我们认为，这样的样本具备足够的多样性，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制造业就业的变迁路径。

图 2 几个国家的人均 GDP 对比（购买力平价）



我们首先关注法国。作为许多高收入国家的代表，法国的制造业部门经历了产值缓慢增长，但就业逐渐萎缩的历程。在 2000 至 2014 年间，法国制造业共损

失超过 80 万个工作岗位，相当于 2000 年法国制造业总就业岗位的 23%。在金融危机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快，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是这一现象的直接成因。

表 3 各要素对制造业就业的贡献：以法国为例

Contribution to employment change in France in percentage points* 以百分点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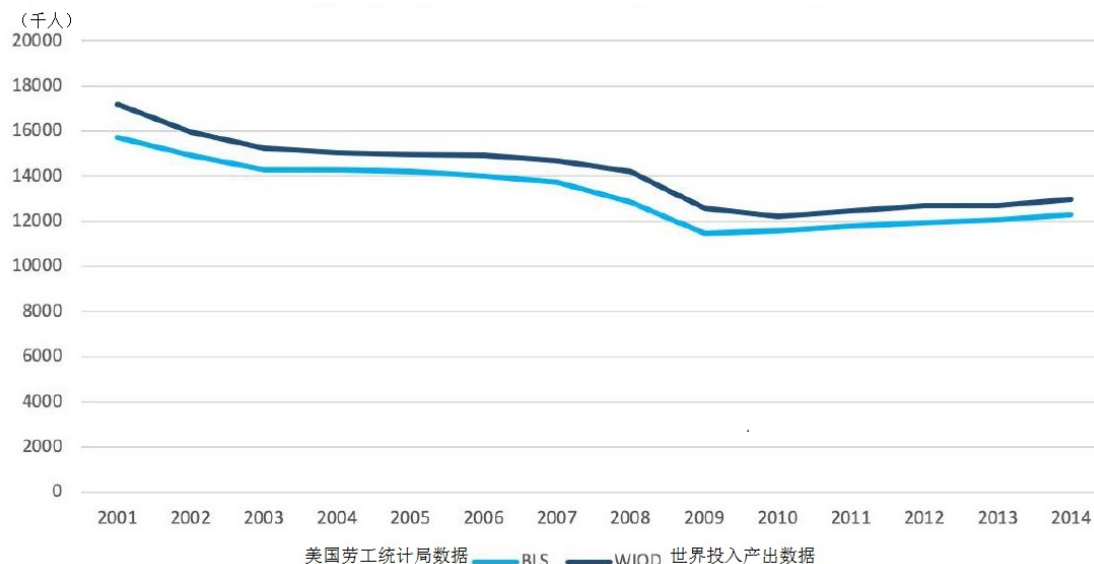
时期 Periods	劳动生产率 Productivity	国内需求（最终品） Domestic final demand	国内需求（中间品） Sectoral trade	国际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	平均制造业就业增速 Average employment growth rate
2000-2008	-2.8%	1.4%	1.3%	-1.5%	-1.6%
2008-2014	-2.2%	-3.1%	3.7%	-0.6%	-2.2%

Contribution to employment change in thousands of employees** 以绝对数计算

时期 Periods	劳动生产率 Productivity	国内需求（最终品） Domestic final demand	国内需求（中间品） Sectoral trade	国际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	就业岗位增加数 Employment change *
2000-2008	-738.5	377.7	331.2	-391.4	-421.0
2008-2014	-388.8	-546.8	651.9	-101.3	-385.0

除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贸易赤字的不断累积也是法国制造业就业萎缩的重要原因，在金融危机前则更是如此。金融危机爆发后，法国制造业部门减少了从其他部门的购买规模，从而部分缓解了制造业就业快速下滑的趋势（见表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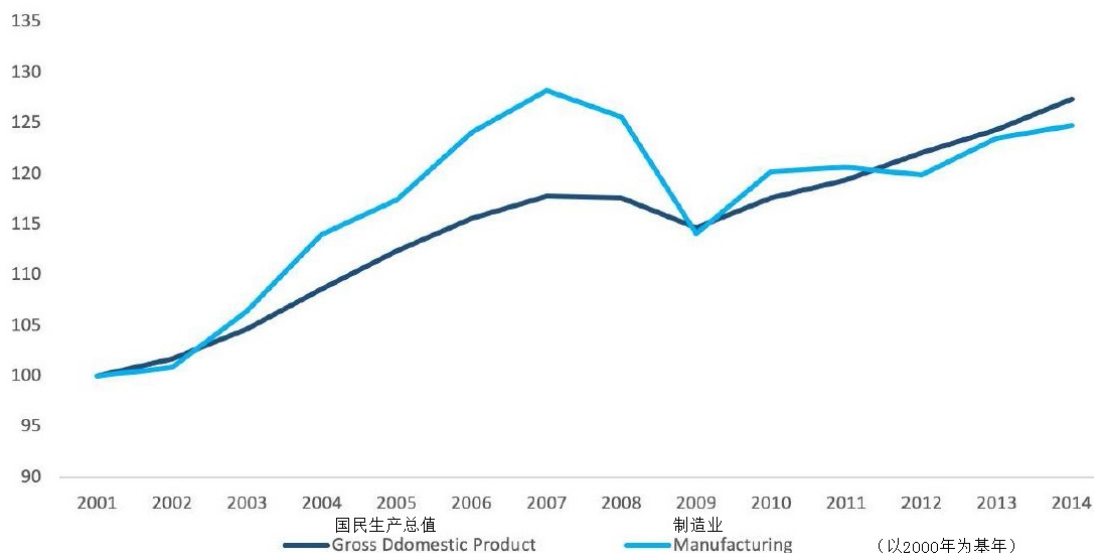
图 3 两套数据中的美国制造业就业变迁情况



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在 2001 至 2014 年间共减少了 350 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相当于期初的 27%（见图 3）。如果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World Input Output data, WIOD），我们会发现制造业就业的变化趋势基本不变，但数量微有增加。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数据，我们在图 4 中分行业绘制了美国制造业及其他行业实际增加值指数的变化情况。如图所示，在危机前，美国制造业表现良好，平均增速超过了其他行业。但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 年以来美国制造业表现疲软，增速回落至其他行业平均水平。

图 4 GDP 与制造业增加值指数



就美国而言，选取不同来源的数据和平减指数将给我们的估计结果带来显著差异。因此，我们在表 4 中同时展示了基于 BLS（美国劳工统计局,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和 WIO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两套数据估算的结果。在估算制造业部门实际增加值增速时，这两套数据的差异尤为明显。

表 4 各要素对制造业就业的贡献：以美国为例

Contribution to employment change in percentage poi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以百分点计算					
WIOD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					
Periods	Productivity	Domestic final demand	Sectoral trade	International trade	Average employment
时期	劳动生产率	国内需求（最终品）	国内需求（中间品）	国际贸易	g平均就业增速
2001-2008	-5.5%	1.9%	0.5%	0.3%	-2.7%
2008-2014	-3.7%	4.3%	-1.9%	-0.1%	-1.5%
BLS database 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					
2001-2008	-2.9%	2.8%	-1.4%	-1.3%	-2.8%
2008-2014	-2.2%	3.7%	-1.8%	-0.5%	-0.7%
Contribution to employment change in thousands of employees* 以绝对数计算					
WIOD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					
Periods	Productivity	Domestic final demand	Sectoral trade	International trade	Employment
时期	劳动生产率	国内需求（最终品）	国内需求（中间品）	国际贸易	就业增量
2001-2008	-6 051.9	2 156.3	605.1	324.1	-2 966.4
2008-2014	-3 031.6	3 490.5	-1 587.0	-93.7	-1 221.8
BLS database 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					
Periods	Productivity	Domestic final demand	Sectoral trade	International trade	Employment
时期	劳动生产率	国内需求（最终品）	国内需求（中间品）	国际贸易	就业增量
2001-2008	-2908.5	2826.0	-1451.5	-1327.0	-2861.0
2008-2014	-1661.0	2831.3	-1367.6	-360.7	-558.0

两套数据均显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美国制造业就业下滑背后最主要的作用因素，在危机之前尤其如此。在危机爆发后，美国国内对制造业工业品的需求迅速上升（两套数据均证实了这个现象），这部分抵消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就业损失。此外，制造业部门对中间品的净需求也促进了就业下滑。到 2014 年，美国制造业部门已经成为其他部门的净消费者，这意味着制造业部门从其他行业的总购买额要大于对他们的总销售额。这提醒我们，在分析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时，也应重视其国内的供应链分布情况。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的一项报告，在 2010 年，美国仅有三分之一与制造业相关的就业岗位产生于严格意义上的“制造业企业”，这些就业岗位既包括与制造业相关的研发工作，也包括相应的销售、物流等业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制造业企业选择将这些工作外包给第三方企业，而这些第三方企业往往在统计中被归为服务业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制造业就业有所冲击，但国际贸易对美国的负面影响

并不大。考虑到危机前美国制造业贸易逆差扩大了 60% 以上，这项发现确实有些令人惊讶。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由于贸易逆差的名义量包含了价格因素，因而名义数据可能夸大了贸易对制造业就业带来的实际冲击。如果采用实际量（以出口商品的数量计算），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美国制造业的贸易逆差只扩大了 26%，比名义值计算的结果要小得多。

对于我们的这项发现，或许有学者会提出不同意见。Houseman（2018）曾提出，由于美国制造业增加值高度集中于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行业，而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又较快，因而加总数据将给人一种错觉，即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造成了制造业就业流失。如果将视角转向其他行业，那我们应该会看到国际贸易才是导致就业流失的主要推手。针对这种观点，我们也做了相应的稳健性检验——在排除了美国与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行业相关的企业后，我们重新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劳动生产率依然是在诸多影响制造业就业的因素当中作用最明显的，这说明我们的发现是稳健的。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等收入国家制造业的就业趋势显示出了高度的国别异质性。我们首先以中国为例。在中国的案例中，我们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数据质量问题——根据 ILO 数据，中国在 2001 至 2014 年间增加了 3230 万个制造业岗位；而在 WIOD 的统计口径中，这一数值竟然高达 6000 万左右。Nick Lardy（2015）曾经指出，由于中国存在较大城乡差异，以及政府和市场机构经常采用不同的统计口径，我们很难找到一套完美的指标来描述中国实际的制造业就业情况。一般而言，位于城市的国有企业就业数据质量最高，而城市民营企业的数据质量则相对较低，农村的小微企业数据质量最差。相较而言，Lardy（2015）的测算与 ILO 数据较为接近，而与 WIOD 数据则相差较大。我们联系了 WIOD 的工作人员，他们承认对中国数据的统计工作存在缺陷，并承诺将出版修订后的新数据。但在本文中，我们决定仅使用 ILO 数据研究中国的制造业就业情况（见表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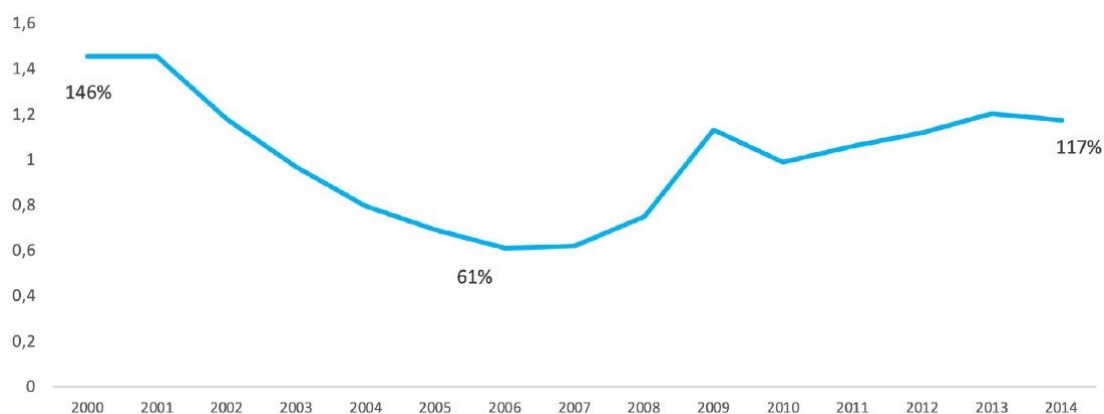
表 5 各要素对制造业就业的贡献：以中国为例

Contribution to employment change in percentage points* 以百分点计算					
Periods	Productivity	Domestic final demand	Sectoral trade	International trade	Average employment
时期	劳动生产率	国内需求（最终品）	国内需求（中间品）	国际贸易	平均就业增速
2001-2008	-13.3%	8.7%	-3.3%	9.7%	1.8%
2008-2014	-11.3%	11.3%	-2.5%	3.7%	1.3%

Contribution to employment change in thousands of employees**(ILO employer)以绝对数计算					
Periods	Productivity	Domestic final demand	Sectoral trade	International trade	Employment change**
时期	劳动生产率	国内需求（最终品）	国内需求（中间品）	国际贸易	就业增量
2001-2008	-143716.7	94021.0	-36257.0	104938.1	18985.4
2008-2014	-115954.4	116364.6	-25640.0	38538.4	13308.6

显然，从制造业的角度来看，中国在过去取得的进步是惊人的，其制造业增加值和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皆达到了两位数水平。不断扩大的国内及国外需求成就了中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在危机前，外部需求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在金融危机后，内需则取而代之，成为制造业增长的坚实基础。在 2007 年，中国制造业的出口额是其国内消化数量的 1.46 倍，而到 2014 年，中国国内市场消化的制造业产值已经比出口规模高出 17%，这还是在中国保持巨大的制造业贸易顺差的基础上实现的。

图 5 中国制造业内需与出口数额的比例关系



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造成了巨大打击。在危机前，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年均增长 20% 以上，而在危机后，这一增速则回落至了 8%。相比之下，对制造业的国内需求则保持了稳步增长的态势（见图 5）。显然，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速的减缓并不能仅仅被外部需求的减弱所解释。实际工资的增加、汇率升值，及鼓励国内消费的政策都对出口起到了削弱作用。

从中间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制造业部门从其他部门的原料采购在过去十几年间不断提高。在 2001 年，中国制造业部门对其他部门保持着顺差，而到 2014 年，制造业部门已经成为其他行业的净消费者，而这也意味着制造业部门将流失部分就业岗位。就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行业内的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而非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数据显示，制造业内部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仅能解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 20%。

之后，我们继而分析摩洛哥的案例。受数据所限，我们仅能获得 2007 至 2015 年间摩洛哥制造业的实证数据。在此期间，摩洛哥制造业流失了超过八万个岗位，相当于期初的 6.8%。在摩洛哥，其国内对制造业的需求增长迅猛，但这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同样快速增长的劳动生产率所抵消。

表 6 各要素对制造业就业的贡献：以摩洛哥为例

Contribution to employment change in percentage points*					以百分点计算
Periods	Productivity	Domestic final demand	Sectoral trade	International trade	Average employment
时期	劳动生产率	国内需求（最终品）	国内需求（中间品）	国际贸易	平均就业增速
2007-2015	-4.2%	6.7%	0.2%	-3.4%	-0.9%

Contribution to employment change in thousands of employees**					以绝对数计算
Periods	Productivity	Domestic final demand	Sectoral trade	International trade	Employment
时期	劳动生产率	国内需求（最终品）	国内需求（中间品）	国际贸易	就业增量
2007-2015	-392.4	615.5	14.3	-318.8	-81.4

我们关注的最后一个国别案例是土耳其。与中国类似，土耳其制造业就业也经历了大幅增长的过程。在 2001 至 2014 年间，土耳其共增加 180 万个制造业岗位，增幅达到 44%。有趣的是，对土耳其来说，这一成就主要发生在危机之后，而非危机之前，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土耳其在 20 世纪末刚刚经历了一场货币危机，导致其 GDP 暴跌 6%。

表 7 各要素对制造业就业的贡献：以土耳其为例

Contribution to employment change in percentage points* 以百分点计算					
Periods 时期	Productivity 劳动生产率	Domestic final demand 国内需求（最终品）	Sectoral trade 国内需求（中间品）	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	Average employment 平均就业增速
2000-2008	-5.8%	10.8%	-2.3%	-1.9%	0.8%
2008-2014	1.7%	1.8%	0.9%	0.8%	5.2%

Contribution to employment change in thousands of employees** 以绝对数计算					
Periods 时期	Productivity 劳动生产率	Domestic final demand 国内需求（最终品）	Sectoral trade 国内需求（中间品）	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	Employment change* 就业增量
2000-2008	-1912,0	3581,8	-771,7	-636,5	261,7
2008-2014	495,1	534,4	252,8	235,0	1517,2

在随后的复苏过程中，土耳其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6.6%，但就业规模并未扩张。金融危机后，尽管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有所放缓，但土耳其制造业就业却经历了扩张，这是因为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原因可能在于土耳其政府出台了降低工作时长，阻止企业裁员的政策。

5. 制造业就业与经济增长

许多人都相信，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尽管这个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但实证数据是否支持这样的假说？在此，我们希望用一套简单的回归来检验这一观点。具体而言，我们在控制各国期初发展阶段的前提下，试图探究制造业的变迁是否与人均 GDP 增长相关。我们分别使用两套方法来定义制造业变迁——一是制造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二是制造业增加值占社会总增加值的比例。与现有文献（如 Szirmai and Verspagen, 2015）相比，本文的一大改进在于我们使用了实际量，而非名义量，来衡量制造业增加值的大小。正如 Rodrik (2015)所指出的，当价格水平整体下滑时，制造业的名义产出也会自然下降，但这未必会导致其实际量下降，而实际量才是与制造业就业规模最直接相关的变量。由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面临的价格水平近年来普遍有所下降，因此本文采用的改进是重要的。我们发现，无论是用相对就业指标还是增加值指标，制造业的变动与人均 GDP 的相关性都不显著。之后，我们将“制造业变迁”这个变量一分为二，按照其符号正负，分别定义为“制造业扩张”和“制造业收缩”，并重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制造业扩张与人均 GDP 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制造业收缩则没有表现出任何显著的相关性（见表 8）。这意味着，那些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国家，

其人均 GDP 往往也在增长；但即便一国的制造业正在衰退，这个国家仍然有可能平稳增长。

表 8 OLS 回归结果

Variables 变量		1 st specification 回归1
Intercept	截距项	5.7***
Employment share up	制造业扩张	0.4**
Employment share down	制造业衰退	0.04
Logarithm of GDP per capita in 期初人均GDP)01		-0.36**
Adjusted-R2	调整R方	0.13***

(上半部分中，关键解释变量为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例；而在下半部分中，自变量则定义为制造业增加值占经济整体的比重)

Variables 变量		2 nd specification 回归2
Intercept	截距项	6.8***
VA share change UP	制造业扩张	0.2***
VA share change down	制造业衰退	-0.09
Logarithm of GDP per capita in 期初人均GDP)01		-0.53***
Adjusted-R2	调整R方	0.13***

***, **, * significant at 1%, 5% and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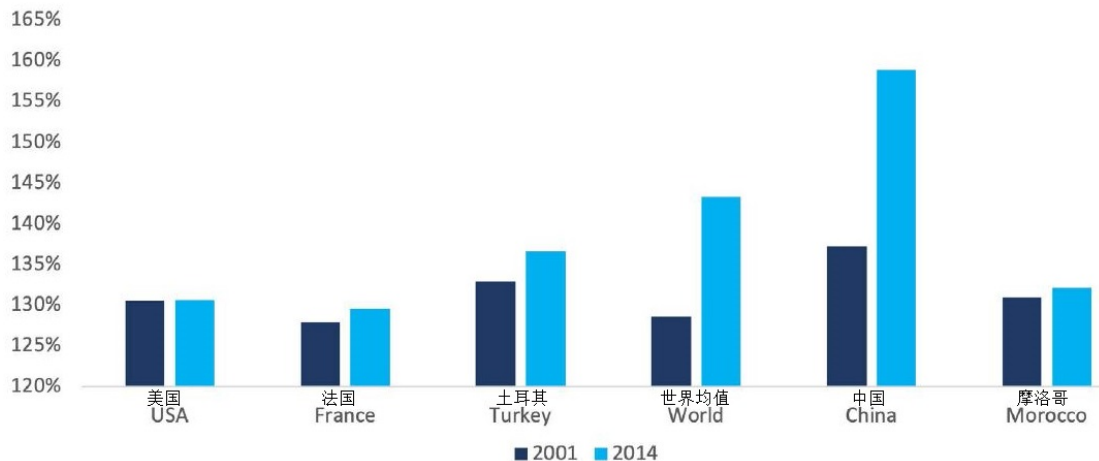
当然，以上回归尚未考虑内生性问题。正如 Cantore et al. (2014)曾经强调过的那样，经济总量、经济增速和制造业的相对占比很可能存在内生相关性。举例来说，一个低收入的、增长快速的国家，其制造业的相对占比往往更大。为了克服这种内生性，我们引入“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比例的变化量”作为工具变量。我们认为，该工具变量与制造业变迁相关，但不与其他影响人均 GDP 的变量相关。

表 9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Variables 变量		回归3 3 rd specification
intercept	截距项	6.8***
Manufacturing exports_share UP	制造业出口占比增加	0.05
Manufacturing exports_share Down	制造业出口占比降低	-0.04***
Logarithm of GDP per capita in PPP i 期初人均GDP		-0.53***
Adjusted-R2	调整R方	0.13***

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与表 9 所示。与先前不同的是，在引入工具变量后，制造业扩张不再与经济增长显著相关。根据以上结果，我们无法得出结论，认为制造业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严谨地说，我们只发现那些制造业扩张的国家往往有更好的经济表现。

图 6 制造业与其他行业的整合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与过去相比，如今许多国家的制造业部门与其他部门的整合程度都更为密切（见图 6），这使得我们更难区分制造业本身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6. 总结

总的来说，我们在文中报告了以下九点现象：

-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 2001 至 2014 年间，全球制造业就业规模稳步增长，但在金融危机后有所放缓。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的对制造业的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劳动生产率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增速要远高于发达国家，这是赶超效应的直接体现。
- 但从历史来看，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已经经历了制造业就业占比的巅峰时期，“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从增加就业的角度来看，服务业和非制造业的工业部门贡献了绝大多数（约 90%）的新增就业。在全球主要的 40 多个制造业国家里，只有 5 个国家实现了制造业就业占比的显著提高。但需要注意的是，受统计口径影响，许多实质上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工作，在统计时都会被计入其他部门。
- 尽管因果性难以证明，但我们发现对许多制造业扩张的国家来说，他们的经济增长表现也十分良好。不过，即便是制造业衰退的国家，也有不少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增长。
- 就制造业的就业趋势来看，各国差异十分明显，但少有国家能有强大的内需增长并足以抵消劳动生产率进步对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举例来说，中国是所有国家当中内需增长最快的之一，其对制造业的国内需求年均增速达到 11.3%。然而，这也仅仅能恰好抵消劳动生产率效应。
- 对绝大多数国家而言，贸易对制造业就业萎缩的影响都是次要的。相比之下，劳动生产率和内需变化才是主要因素。

- 制造业对其他部门的净中间品需求也会影响制造业的就业规模，其影响程度与国际贸易的影响是类似的。过去十几年间，世界总的趋势是制造业向其他部门购买更多中间品和原材料，这也将使得部分就业从制造业向其他部门转移。
- 就国家而言，全球超过半数的新增制造业就业岗位都产生于中国。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变化量要小得多。举例来说，十五年间中国新增了超过 3200 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相比之下，土耳其增加了 200 万个，美国和法国则分别损失了 300 万和 100 万个制造业岗位。
- 尽管国际贸易对就业影响的相对程度有限，但考虑到其巨大的出口规模，中国还是给许多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带来了冲击，在危机前尤为如此。
- 对各国来说，金融危机对国内需求的影响差异较大。对美国和中国而言，由于各自实施了经济刺激政策，这两个国家对制造业的国内需求在危机后反而获得了提升。相比之下，法国和土耳其则经历了衰退。

7. 政策启示

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近年来其制造业一直处于衰退周期中。然而，如果只关注发达国家，那我们对全球制造业的印象就很可能与事实出现偏差。就全球范围来看，制造业仍然处于上升周期，人类对制造业的需求依然在快速上涨。准确地讲，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增长，在可见的未来制造业依然会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Arbouch and Dadush, 2019）。但是，从就业的角度来看，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正在普遍提高，因此稳步发展的制造业并不会创造数量庞大的工作岗位。

若以实际量计算，制造业是全球贸易中占比最大的行业。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会自然而然地将贸易问题与制造业挂钩，而当其本国制造业处于长期衰退时就更为如此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和其他高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夺走”了别国的就业岗位。正如我们在文中所展示的，贸易在制造业就业问题上往往只起到了次要作用。另外，随着中国国内需求的进一步扩张，来自中国的冲击在未来会进一步减少。同时，中国扩大开放和进口的承诺也将对现状带来改变。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而言，他们应该密切关注产业政策和监管政策对本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应当意识到，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往往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自然会影响制造业的就业规模。因此，当评估本国制造业时，他们不应以制造业创造的新增岗位数为唯一标准，而是更应该关注制造业对社会带来的福利改善。

我们的数据显示，在所有国家中，只有一些亚洲国家实现了制造业的快速增长，而这些国家往往是从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起家的。对于这种行业的企业

来说，随着本国工资水平的提高，他们迟早会向更低人工成本的国家转移。放眼未来，还有大量非洲国家拥有年轻、数量庞大且工资水平低廉的劳动力，因此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前景广阔。不过遗憾的是，目前大多数非洲国家还尚未培育出相应的商业环境。

本文原题为“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hina”。本文作者 Abdelaaziz AIT ALI 是总部位于摩洛哥的智库机构新南方政策中心(Policy Center for the New South) 资深经济学家，此前他曾供职于摩洛哥中央银行。Uri DADUSH 是新南方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国际经济政策集团(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LLC) 董事长。本文于 2019 年 11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与欧盟的经济关系

Uri Dadush, Marta Dominguez-Jimenez and Tianlang Gao/文 李陆屿/编译

导读：中国与欧盟有着广泛且不断深化的经济关系。但是，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扭曲，另一方面由于欧盟的联盟不完整造成其内部存在多种利益诉求，中欧关系存在问题。双方之间存在尚未开发的贸易和投资机会，有很多行动都可以抓住这些机会。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活力，再加上最近从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向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的转变，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机会可能越来越多。编译如下：

1. 重要的统计资料

中国与欧盟之间的经济关系非常广泛。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正在迅速接近美国。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及中国与全球供应链的融合，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和用市场汇率计算的最大经济体（已经按照购买力平价调整）。中国的规模和中国崛起的速度造成了许多混乱，但也带来了许多机遇。尽管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增长很可能仍将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有证据表明，中国进入世界市场的最具颠覆性的阶段已经过去。表 1 总结了中国，欧盟和美国的经济情况。

表 1：总体经济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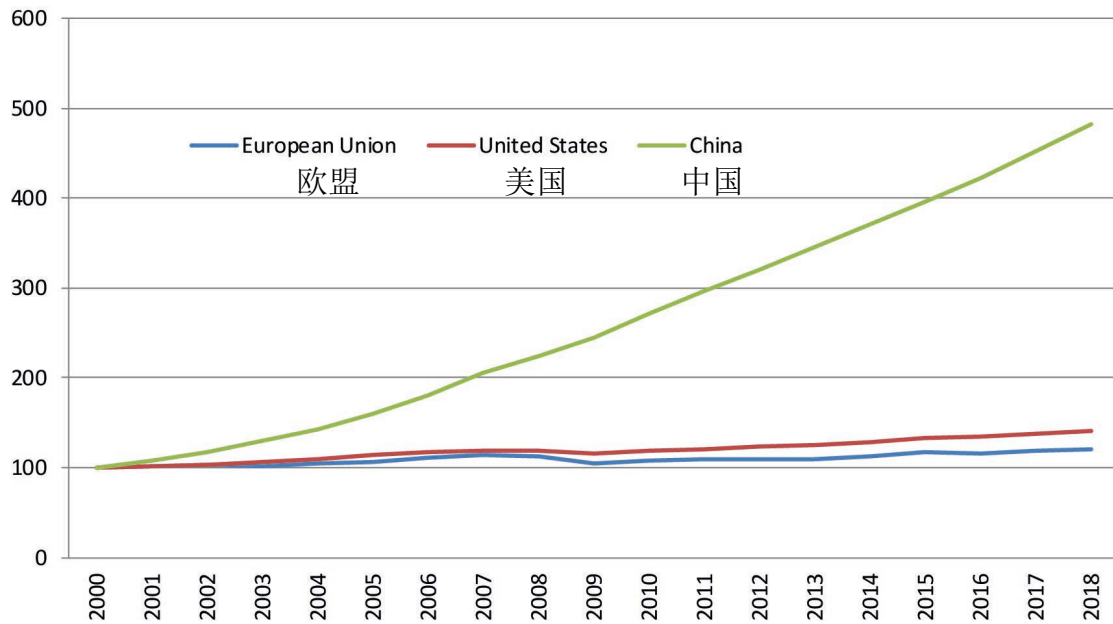
Variable 变量	China 中国	European Union 欧盟	United States 美国
GDP (billions US\$) GDP(十亿美元)	13,608	18,749	20,494
GDP (PPP, billions \$) GDP(PPP,十亿美元)	25,363	22,732	20,494
GDP, per capita (US\$) 人均GDP(美元)	9,771	36,532	62,641
GDP, per capita (PPP US\$) 人均GDP(美元)	18,210	43,715	62,641
Population (millions) 人口	1,393	513	327
10y GDP growth rate (%) 10年gdp增长率	7.95	1.00	1.76
Current account (% of GDP) 经常账户	0.36	1.44*	-2.38

Source: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9 (for EU current account).

自 2000 年以来，中国的实际 GDP 增长了近五倍，而欧盟增长了 20%，美国增长了 41%（图 1）。在此期间，中国的平均增长率为 9%，并始终保持在 6% 以上。要看中国的快速增长，必须看到中国初期的发展水平很低。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仍仅为欧盟的四分之一左右，按购买力调整后约为 40%。尽管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按购买力平价折算，每天低于 2 美元左右）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但仍有 27% 的人口生活在按购买力平价折算为每天 5.50 美元或更少的水平上，这是世界银行对中度贫困和对经济冲击高度脆弱人口的定义。这一比例与智利的 6.4% 和黎巴嫩的 1.9% 相当，而目前这些国家正陷入针对贫困和不平等的暴力抗议。尽管人们普遍忧虑中国的其强大潜力，但事实上，即使在制造业（占世界贸易的大部分），中国的生产力也远远落后。2017 年，中国制造业的人均产出为 24,470 美元，仅是美国制造业（人均 180,270 美元）的七分之一。

(Lawrence,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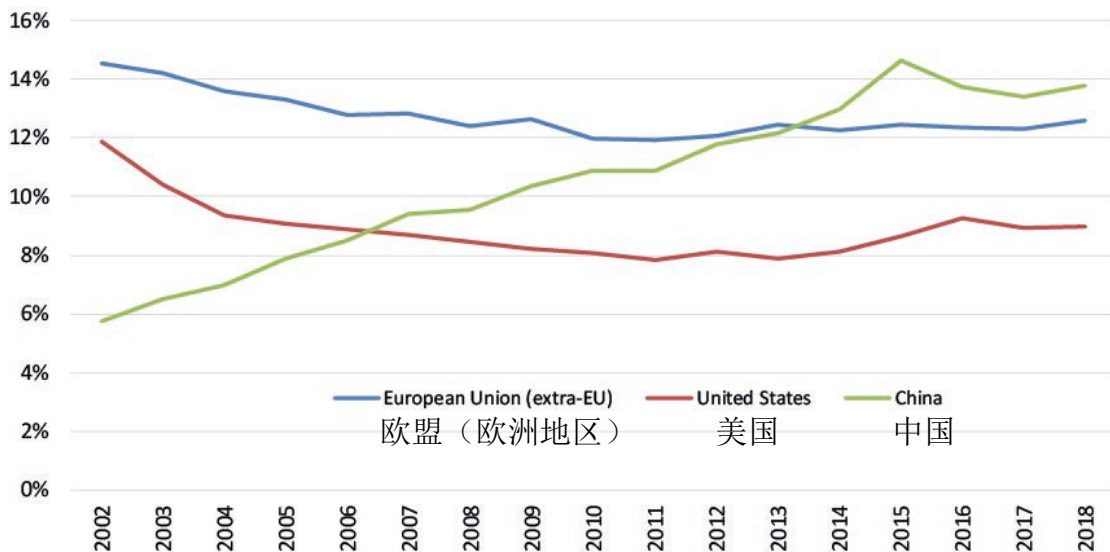
图 1: GDP, 可比价格 (2000 = 100)



数据来源: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April 2019 (gross domestic product, current prices in US dollars).

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其他经济体,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但近年来却有所放缓。如图 2 所示,中国在世界出口市场中的份额从 2000 年的 3% 激增至 2015 年的约 11%,此后一直保持稳定。但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是由于初始阶段融入国际市场的程度较低。即使到了今天,中国的人均出口仍保持在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德国的十二分之一。

图 2: 出口商品, 市场份额, 占世界总出口百分比



数据来源: World Bank WITS (<https://wits.worldbank.org/>).

近年来，中国的增长模式已转向由国内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迅速发展。消费在 GDP 中所占的份额在短时间内急剧上升，从 2012 年的 35% 增加到 2017 年 2 月的近 40%（IMF，2019 年），而服务在 GDP 中的份额则从 44% 显著增长到 52%（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大量信贷扩张推动了消费激增，反映出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公民进入中产阶级（Kharas，2010）。尽管如此，与欧洲相比，中国的消费市场仍大大落后。中国每千人中有 110 辆汽车，是 2000 年的四倍，但仍仅为欧盟的四分之一。即使中国汽车市场刚刚开始发展，其市场和产量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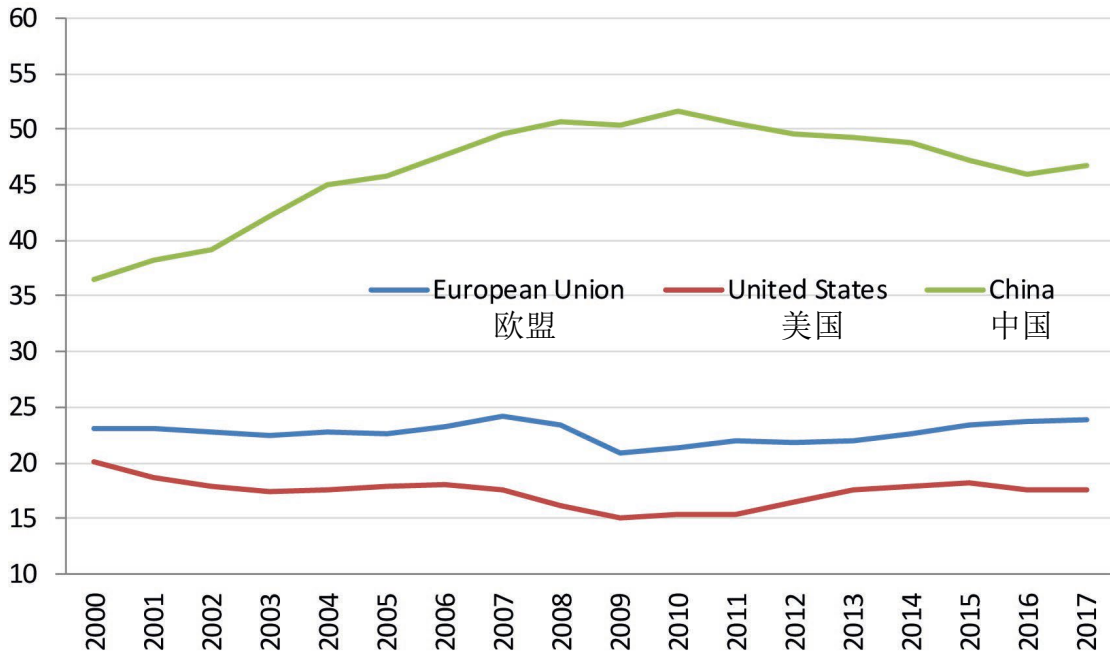
出国旅行是富裕的又一体现。而出国旅行正在中国迅速发展：去年，中国公民出境旅行超过 1.5 亿人次，而在本世纪的头十年，每年平均为 3000 万人次。根据最近的预测（Kharas，2017），到 2030 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将达到 12 亿，尽管中国中产阶级的平均水平将不及欧盟国家的富裕程度，但总购买力将达到大大超过欧盟。中国经济在某些方面正变得越来越“正常”。中国经济增长不仅受到国内消费的驱动，而且与亚洲奇迹一样，在经历了一段非凡的增长期之后，其增长趋势正在急剧放缓。此外，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减速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伤害，就像对世界各国一样。但是，由于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一党制以及政党对经济决策的影响，中国经济在其他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近年来，中国的增长似乎主要受到国内障碍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其国有部门的改革放缓，其非金融公司部门的债务高企和上升以及监管部门对其影子银行扩张的反应-银行部门。自 2016 年以来，贸易紧张局势也发挥了作用。

中国的增长速度从 2018 年上半年的 6.8% 下降到下半年的 6%。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 年 7 月世界经济展望》，预计 2019 年中国经济增速为 6.2%。财政刺激和中国人民银行（PBOC）的流动性拨备以及降低存款准备金率（RRR）有助于缓解经济放缓的趋势。IMF 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到 2024 年，中国的增长将继续减速至 5.5%（IMF，2019 年）。尽管如此，中国的趋势增长估计仍是美国的三倍左右，是欧盟的四倍。

多年以来，中国的经常账户结构性盈余很大。2007 年，就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达到了 GDP 的 10% 的峰值。危机过后，财政、货币刺激和工资上涨刺激了私人消费，导致中国的储蓄率从高位直线下降，占比从 GDP 的 52% 降至 45%。然而，中国的国内投资率一直很高，到 2018 年，经常账户顺差已基本降至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中国在 2019-2024 年间的经常账户盈余将占 GDP 的 0.5% 左右。一些预测者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赤字将进一步加剧。其他预测者则预计盈余会上升，因为中国放开了资本账户，资本外流的增加，同时允许汇率贬值（Setser，2019），或者因为储蓄率的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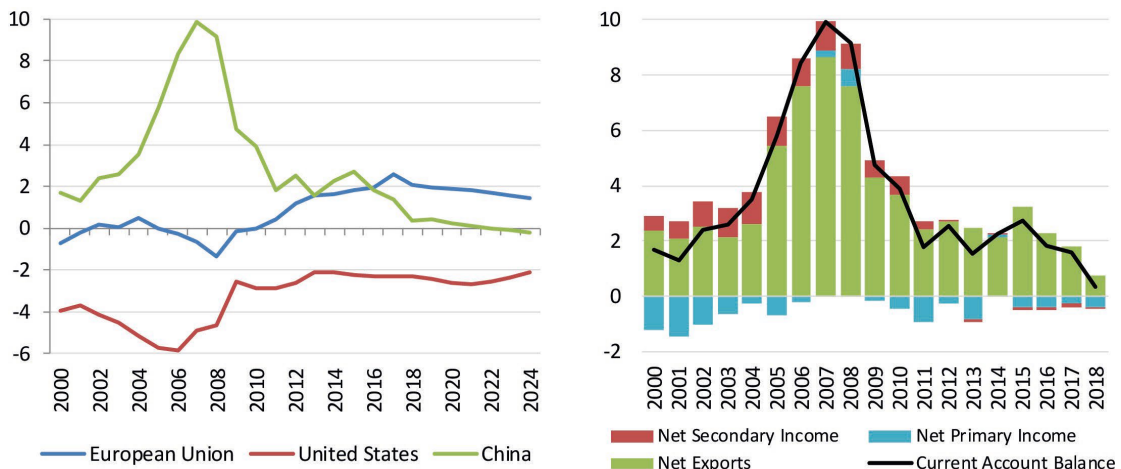
的同时，公共投资减少（Garcia, Herrero, 2019a）。

图 3：国内储蓄总额，占 GDP 百分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 4：经常账户余额，占 GDP 百分比（对中国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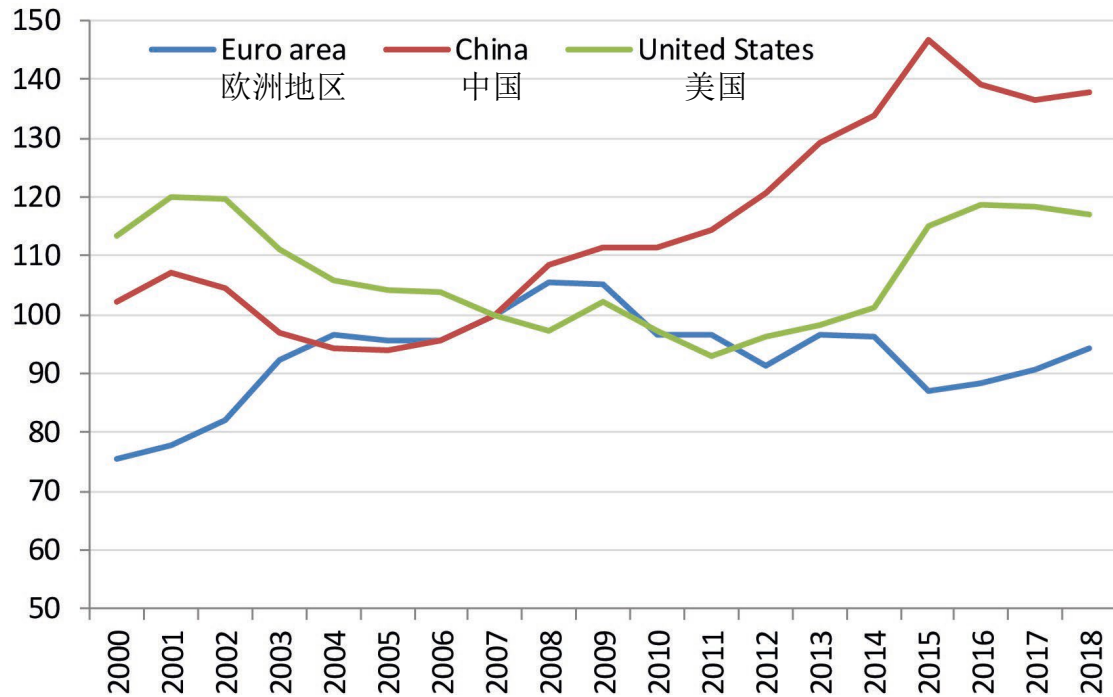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April 2019 (left panel) and World Bank (right panel).

尽管意见并不统一，但随着中国人消费而非出口更多的可交易商品和服务，对我们来说，大规模，快速渗透世界市场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目前，中国出口占 GDP 的比重为 19.5%，对于同等规模的经济体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水平（美国经济的相对比重分别为 12.1%），而且如上所述，美国增长速度不及中国的 GDP。最近几年，甚至未来中国的出口在 GDP 中的份额保持这一水平是不太可能的（人们可能会希望这一份额下降，接近欧盟和美国的水平），而且中国的 GDP 增长率仍将保持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约 2%），中国的出口份额将以每年

0.2%的速度增长，远没有过去那么快。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人均出口额可能会与其人均 GDP 大致保持一致，但可能永远无法与人口和国内市场潜力相差甚远的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相提并论。这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的成熟，与之前的罕见爆发期相比，中国经济对世界市场的破坏力可能较小。

图 5：真实的有效汇率



数据来源：Bruegel based on Darvas (2012) and the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indices。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保持对外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自 2000 年以来，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REER）上升了 40%，而美国和欧盟的实际汇率则没有明显的趋势波动（图 5）。中国的 REER 升值通过增加实际收入和消费，以及将经济转向服务业和建筑业等非贸易或较难贸易的部门，同时减缓了制造业的增长，从而减少了经常账户盈余。中国在 2005 年放弃了严格钉住汇率的货币，转而实行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目的是逐步兑美元升值。REER 在 2015 年至 2017 年之间的下降可以用资本外逃来解释，而资本外逃发生在有利于长期汇率弹性的 PBOC 发出信号后（Das, 2019）。近年来，美元的走强使中国人民银行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在 7 美元以下的努力更加困难（最近已经打破了这一界限）。随着中国经济的成熟和资本账户的开放，长期的货币灵活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话虽这么说，近年来中国的资本管制越来越严格，尤其是在 2015 年人民币贬值之后。但是，这些措施主要是作为对中国疲弱的金融体系的临时保护，以减轻当时正在发生的大量资本外流。

经济学理论和广泛的经验证据表明，在适当的情况下，加强商品，服务，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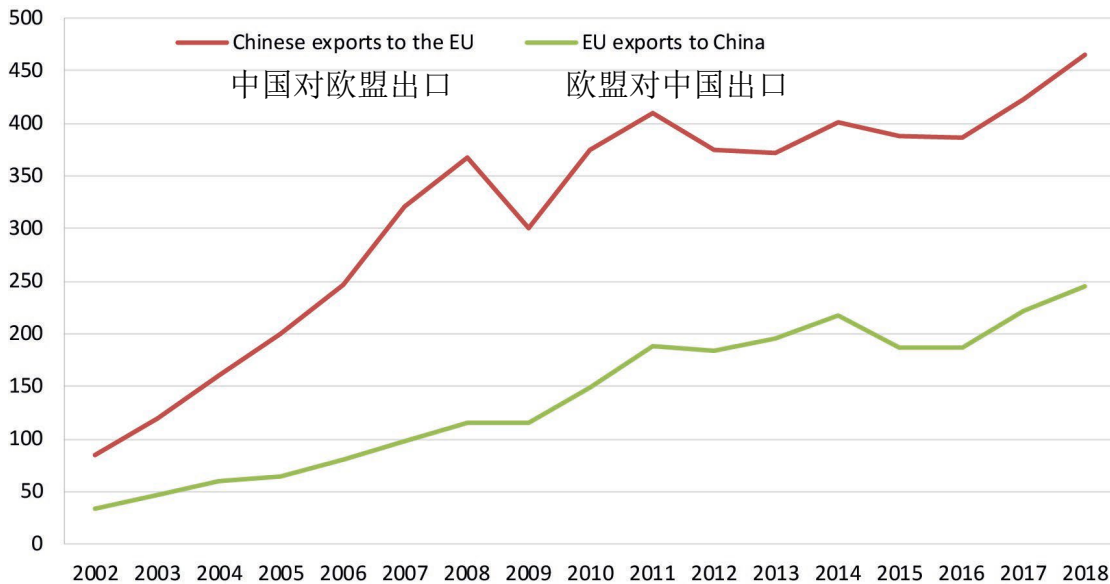
本，人员和技术/知识/数据市场的整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福利。确实，这是支撑欧盟单一市场的前提，也是欧盟不断努力扩大和加深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的前提。在本节中，我们将从贸易开始考察中国与欧盟之间相互作用的主要经济渠道。

2. 双边贸易流动

自 2001 年 12 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欧盟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平均每年增长 10% 以上，服务出口每年增长 15% 以上。这为欧盟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但是，由于从中国的进口也迅速增长，因此欧盟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欧盟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长甚至更快，欧盟现在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二大中国商品出口市场。自 2002 年以来，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增长至 2200 亿美元（图 6），约占欧盟 GDP 的 1%。双边贸易逆差的扩大反映了一个基本影响：中国已经在对欧盟出口了，尽管欧盟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快于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同时，欧盟与世界的总体贸易平衡已经很好地转移到了积极的领域，而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平衡已经从总体顺差转移到了平衡。

图 6：中欧贸易总量（十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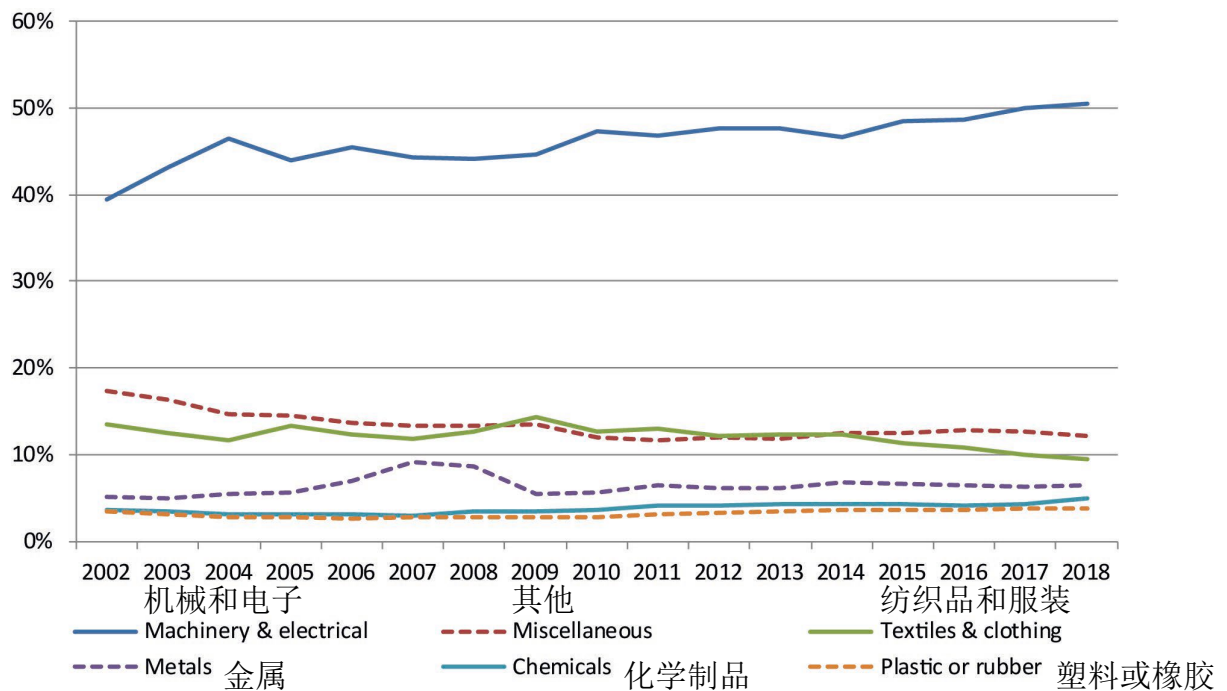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orld Bank WITS (<https://wits.worldbank.org/>)。

对于任何一对贸易伙伴，最好是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而不是从狭义的双边角度来理解中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重要的一点是，即使中国向欧盟购买的产品不如向欧盟出售的产品多，欧盟仍保持总体贸易顺差，因为欧盟对中欧之外第三方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使顺差成为可能。反过来，第三方对中国的出口激增。事实上，在目前有数据的 186 个国家中，中国现已成为 33 个国家的最大出口目的

地（麦肯锡，2019年）。因此，从2002年到2017年，欧盟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平均每年增长约9%，但欧盟与除中国外的所有国家的贸易差额平均每年增长约23%。

中欧贸易结构的变化反映了自千禧年以来中国经历的经济转型。随着中国向价值链的上游发展，欧盟从中国进口的机械和电气设备的份额不断增长：在2002年至2018年间从不足40%增至50%以上（图7）。更广泛地说，资本品已超过消费品成为欧盟从中国进口的主要类别，占2018年欧盟从中国进口总量的一半。

图7：中国占欧盟进口份额（按产品种类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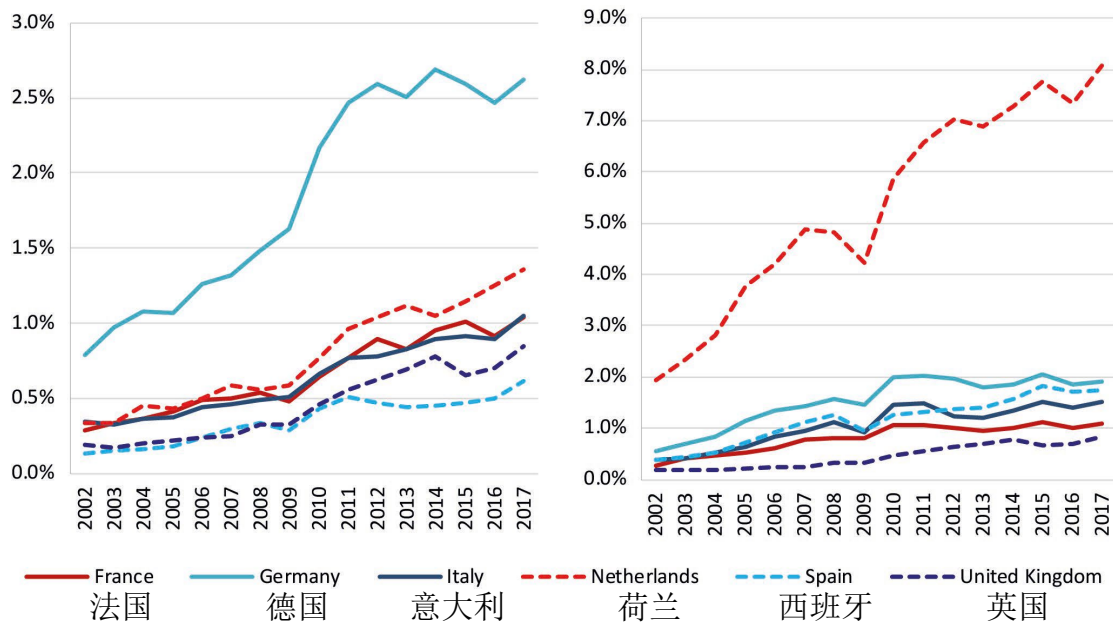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orld Bank WITS (<https://wits.worldbank.org/>)。

同时，欧盟对中国的机械和电子设备出口份额大幅下降，从2002年的50%多下降到2018年的30%，而中国对欧盟的交通工具的进口量，包括汽车，飞机，和化学产品的进口量都稳步发展。就大类而言，与中国的再平衡相一致，资本货物在欧盟对中国出口中的份额下降了约15%，而消费品的份额则以大致相同的比例增长。

根据CEPII（2019）的分析，在2007年至2017年期间，中国显示的比较优势在电信设备，电气设备和纱线面料方面急剧上升，但在其他制造业，纺织服装和成衣领域则有所下降。同时，中国在旅行服务，运输，食用农产品（谷物除外）和非货币黄金方面的相对劣势（中国存在贸易逆差的行业）有所增加。

图 8：中欧贸易，按成员国划分（2002-17）（占成员国 GDP 百分比）



数据来源：World Bank WITS (<https://wits.worldbank.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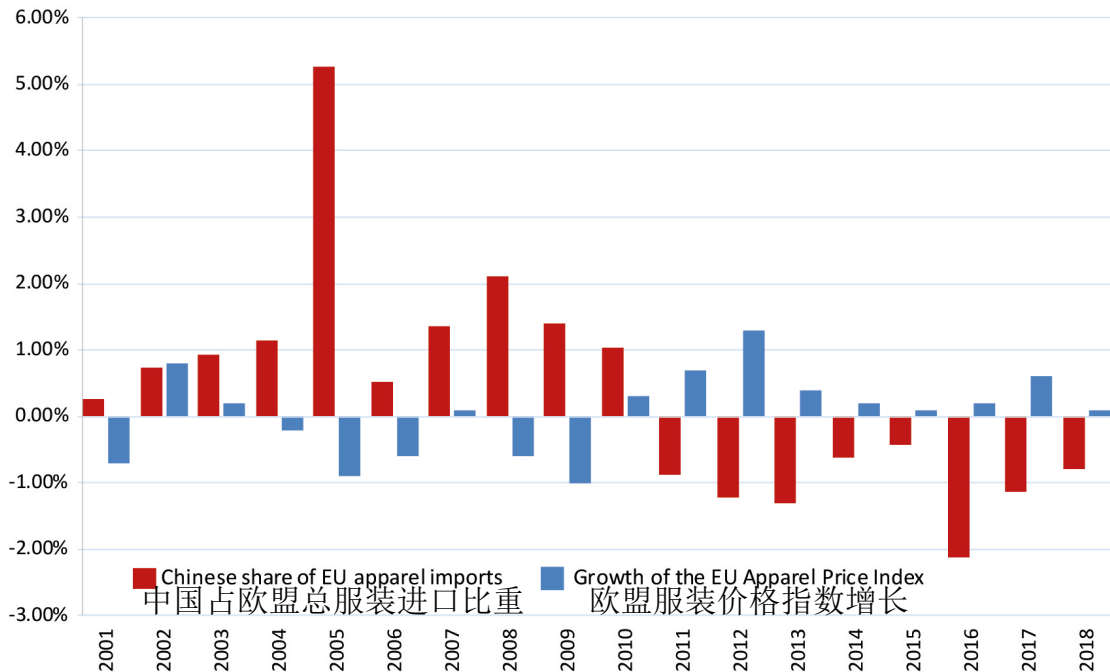
图 8 显示了按成员国分类的中国在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由于所谓的“鹿特丹效应”，使荷兰的进口被高估了，因为许多运往其他欧盟国家的商品到达鹿特丹港口和其他荷兰港口，从而扩大了荷兰的份额。在撰写本文时，只有德国和瑞典对中国的商品有贸易顺差。实际上，2017 年，欧盟对中国的出口中有 44% 来自德国，几乎是接下来的 9 个国家的总和。德国对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份额，用德国 GDP 的份额表示，占 2.5%。这个份额比日本小一点，比大多数欧盟国家和美国大三倍。

关于贸易政策的政治讨论往往集中在进出口带来的竞争上。许多研究已经验证了贸易带来的破坏，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带来的破坏。对美国来说，这些影响最为明显。美国始终是开放的经济体，社会安全网络非常薄弱。但是，某些欧盟部门也强烈感受到了这种破坏。例如，Utar（2014）发现，来自中国的竞争对丹麦纺织和服装业的就业，增值和无形资产产生了负面影响。Balsvik 等人（2014 年）发现，在挪威，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的约 10% 来自中国的竞争。但是，工资没有受到影响。

相反，尽管经济理论表明，消费者通过增加竞争，降低价格，提高质量和增加品种而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但是这种利益往往很少引起关注。但正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说，从事国际贸易的目的是进口，而出口只是支付进口货款的一种手段。在当前的全球价值链时代，贸易中很大一部分采用零件，原材料和机器的形式，其中一些零件不是在本国市场上生产的，而是专门进口的，进口对于提高生产效率至关重要，而不仅仅是对消费至关重要。中国对欧盟的最

大出口商品是电信设备，计算机零件，婴儿车，电机，服装和鞋类。这些产品从中国的流入无疑扩大了欧盟消费者的消费范围，同时也以低价供应了大量的中间产品或投入品，从而提高了欧盟工业的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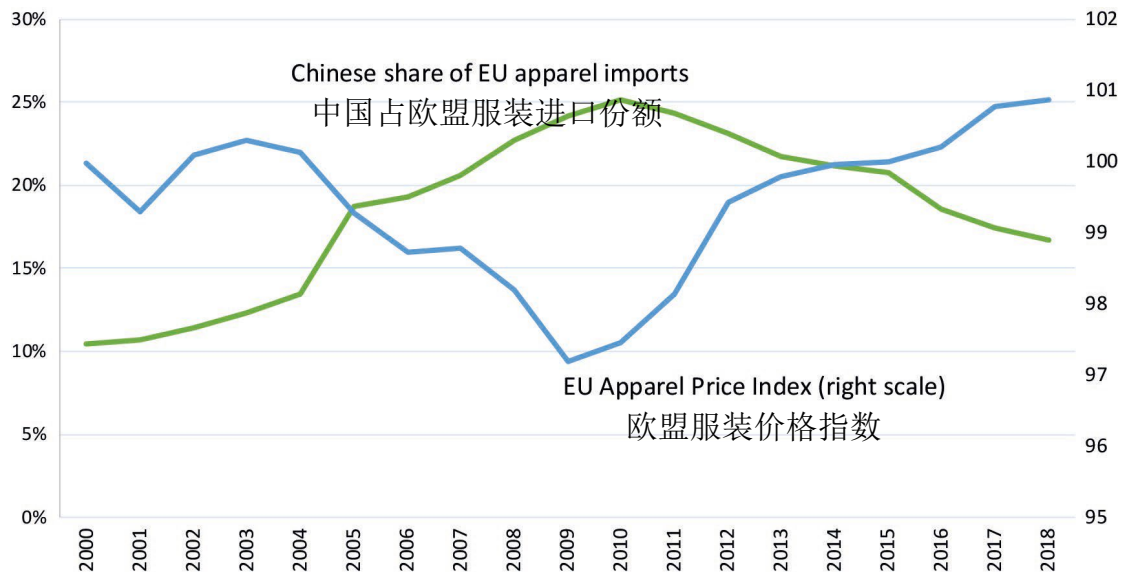
图 9：欧盟服装价格指数年增长（HICP，2015 = 100）和欧盟从中国进口服装份额变化



数据来源：Eurostat. Notes: Change in the share of EU apparel imports from China is displayed in percentage point, the annual average rate of change clothing and footwear HICP also in percentage (2015 = 100).

来自中国的进口品似乎对欧洲消费者在某些行业面临的价格上涨产生了重大影响。与 Lau（2018）获得的关于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对美国服装市场的价格影响的结果一致，欧盟从中国进口的服装也被发现有助于抑制欧盟服装价格的上涨。从 2003 年到 2009 年，欧盟服装价格指数的年增长率几乎总是与中国在欧盟服装进口中所占份额的年度变化相反。如图 9 和 10 所示。在此期间，每当中国在欧盟服装进口中所占份额上升时，欧盟服装价格指数就会下降，反之亦然。欧盟从中国进口的服装份额在 2010 年达到 25% 的峰值。从那时起，所观察到的影响已开始被欧盟从其他国家（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服装进口份额的增加所抵消。

图 10：欧盟服装价格指数（2015 = 100）和中国占欧盟总服装进口比重



数据来源：Eurostat 注释：Level of EU Apparel Price Index (2015 = 100). Share of EU apparel imports from China is displayed in percentages.

3.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如上一节所示，中欧贸易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迅速增长。但是，仍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许多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阻碍了最近的进展。

尽管中国出口商不得不在某些敏感行业中应对欧盟的高关税和各种贸易保护措施，但欧盟企业在中国所面临的关税要高得多，涵盖的行业范围也更大。这些关税远高于欧盟公司在美国或日本被征收的关税。2017年进入美国的欧盟产品的平均有效适用关税为1.4%，进入日本的欧盟产品为2%。这与中国对欧盟产品征收的8.75%形成鲜明对比。考虑到欧盟在2018年向中国出口了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这意味着从欧盟向中国出口的企业支付了约175亿美元的关税。欧盟公司去年向南方共同市场支付的关税（欧盟于2019年6月与南方共同市场达成了贸易协定），约占向中国支付的关税的四分之一。

汽车和汽车零部件是2017年欧盟对华出口的最大产品类别，被征收了近20%的有效关税。仅从欧盟汽车出口商处，中国海关就在2017年征收了54.9亿美元的关税。然而，在2018年，中国国务院采取措施，将车辆关税从25%降至平均13.8%。这是重要的进步，也为欧洲汽车制造商从中国不断扩大的汽车市场中获利提供了新机遇。

中国出口商在大多数部门进入欧盟市场的关税较低。2017年，欧盟对中国产品有效实施关税的加权平均值为3.6%，不到欧盟产品向中国缴纳的关税的一半。总计，中国企业向欧盟出口的关税总额约为144亿美元。机械和电子设备是中国2017年对欧盟的两大出口产品，分别占中国对欧盟出口总额的50%以上，

被征收的有效征收的关税分别为 1.2% 和 0.8%。中国对欧盟的服装和鞋类出口被征收超过 11% 的关税。普遍认为，中国是服装和鞋类市场的主要价格制定者，使得关税更有可能主要转移给欧洲消费者。这些对中国的关税也被加征于与欧盟没有贸易协定的其他 WTO 成员。

尽管存在关税壁垒，中欧贸易关系仍取得了进展，如中国降低了对欧盟汽车和零部件出口的关税。自 2018 年以来，中国降低了来自欧盟的进口奢侈品和服装产品的关税，使法国、意大利和其他欧盟成员国受益¹。在中美贸易紧张之时，中国提高对美国产品的关税意味着，欧洲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更多²。

但是关税并不是中欧贸易关系的全部内容。在许多方面，非关税壁垒 (NTB) 发挥着更大的作用。NTB 包括对政府采购的限制，农产品的进口配额和各种形式的补贴。非关税壁垒还包括贸易救济，尽管可以用与世贸组织完全兼容的方式进行贸易救济，人们还是通常会怀疑它们是一种保护主义形式。欧盟委员会统计了中国正在针对欧盟出口产品采取的 18 项贸易保护措施³。中国的贸易救济调查局 (TRIB) 定期对欧盟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涉及从中间产品到化学品的各种出口产品，尽管欧盟贸易保护的力度肯定很小⁴。

某些具体措施阻碍了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例如，欧盟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包括饮料），乳制品和各种高附加值贸易品类（通常都适用 NTB），包括产品认证，标签标准，进口批准要求和清关延误 (Niemi 和 Huan-Niemi, 2007)。尽管中国逐步减少了这些非关税壁垒，但中国的国内农业标准和海关程序的区域差异一直阻碍着农产品贸易。可以肯定的是，欧盟对农业进口的补贴和贸易壁垒也很大。但是，由于中国是农产品的最大净进口国，而且其农产品出口通常在欧盟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因此欧盟设置的农产品贸易壁垒不太可能对这两个集团之间的贸易产生太大影响⁵。

公共采购程序代表了欧洲企业在中国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障碍：中国法规支离

¹ The positive consequences of trade liberalisation are seldom disputed, as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Nicita (2009) found tariff liberalisation to have increased households' purchasing power following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Mexico in the 1990s. Similarly in India, De Loecker et al (2016) showed that prices and marginal costs of production fell significantly. Amity et al (2017) found that between 2000 and 2006,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contributed to a 46 percent decrease in the import price index in the US. Lastly, Cernat et al (2018) estimated that EU households would have saved annually around €60 billion in import consumption if tariffs were reduced to the pre-Uruguay round level.

² A point made by García-Herrero (2019b).

³ See <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accessing-markets/trade-defence/actions-against-exports-from-theeu/>.

⁴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see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0/september/tradoc_146659.pdf and <http://trade.ec.europa.eu/actions-against-eu-exporters/cases/index.cfm>.

⁵ In November 2019, China agreed to recognise a number of EU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See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9_6200.

破碎，前后不一致且执行不力。根据欧盟中国商会（2011）的估计，由此产生了效率和创新损失，使得在华欧洲企业受到的损失大小相当于一整个韩国的经济规模。

中国的不同部委和不同级别的政府都对公共采购施加了法规，这些法规偏重于本地公司，并强调“自主创新”。尽管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作出了一项承诺，但中国还没有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这是 40 个世贸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开放各自的非国防公共采购市场的多边协议。在公共采购流程的每个步骤中，欧洲公司都面临透明度的缺乏，评估标准的不明确以及市场互不互惠的问题。

在较小程度上，欧盟采取了大量自己的贸易保护措施（TDI）来反对看起来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而中国通常是这些贸易保护措施的目标。欧盟正在进行 20 项针对中国对欧盟出口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⁶。在某些产品类别中，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施加配额。例如，欧盟 2019 年从中国进口的汽车级 HDG（热浸镀锌）钢配额于 6 月底用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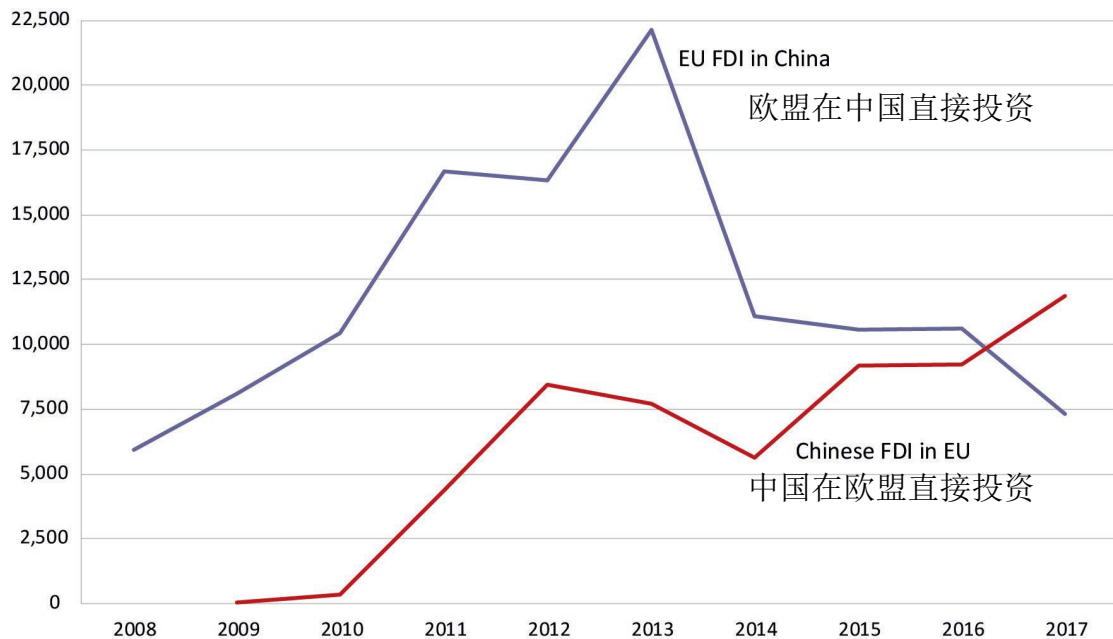
中国过剩的生产能力也影响了欧盟的某些行业，尤其是钢铁行业。由于欧盟部署了 TDI，钢铁目前仅占中国对欧盟出口总额的不到百分之一。截至 2019 年 8 月，欧盟采取了 16 项贸易救济措施（通过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为国内钢铁行业抵制来自中国的钢厂产品提供了救济（国际贸易管理局，2019 年）。

4. 境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

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与贸易密切相关，是对贸易的补充，因为 FDI 能促进市场网络的发展，提供了金融和运输服务，并实现了产品在全球市场上销售的目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量也可以替代贸易，例如，投资者在同一市场上建造设施，来进行生产和销售。此外，投资者购买竞争对手或供应商的控股权益（包括原材料在内），通常会促进全球或区域价值链，从而刺激贸易。毫不奇怪，随着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激增，外国直接投资也增加了。然而，相对于中欧两个经济体的庞大规模而言，双边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量仍然很小，并且波动很大（图 11）。

⁶ See <https://trade.ec.europa.eu/td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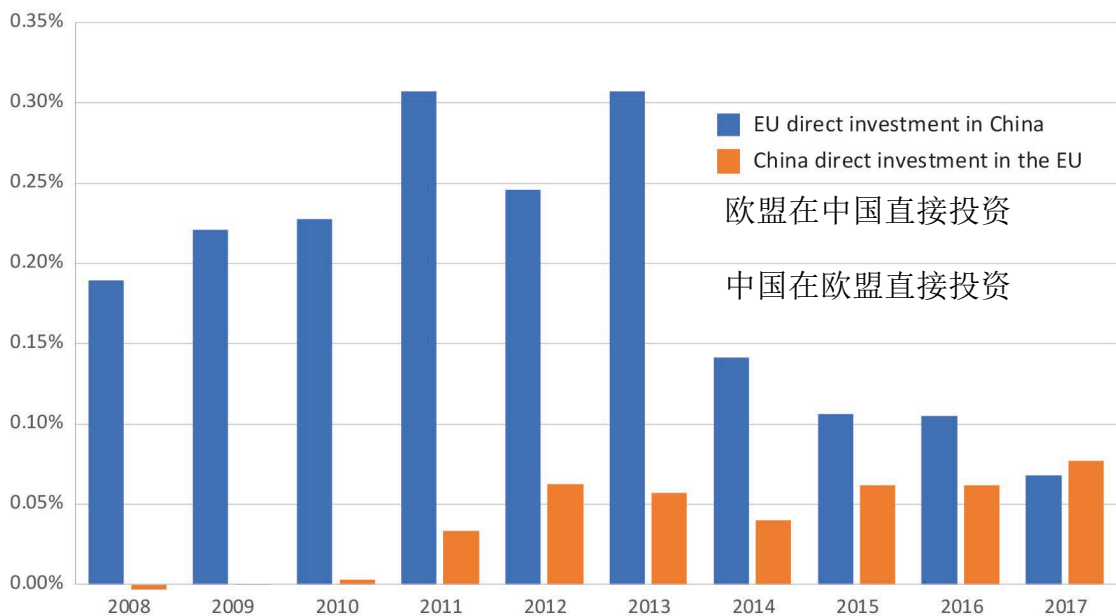
图 11：每年中欧直接投资流（€百万）



数据来源：Eurostat

尽管如此，从 2008 年到 2017 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从 540 亿欧元增长到 1,780 亿欧元，增长了 225%。与此同时，过去十年中，中国在欧盟的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了近十倍，2017 年达到 590 亿欧元。

图 12：每年中国投资流占流入方 GDP 份额（百分比）



数据来源：Bruegel based on data from Eurostat, BEA, FRED, World Bank, OFX.

近年来，欧洲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下降，欧洲投资者抱怨在中国面临的许多障碍，因为中国的投资者保护水平很差，市场准入条件高度不平衡，有时是这些条件是武断的。欧盟投资者的主要顾虑一直是在许多经济部门设立的对企

业的合资要求。其中有 13 个部门经常涉及将知识产权转让给中国对应方，使得投资中国商业的吸引力降低。来自中国公司的竞争加剧和工资上涨，也减少了在华投资的动机（Garcia Herrero and Xu, 2019）。

然而，据认为，大量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将通过其他国家进行安排（因此可以提供更大的投资者保护），这种关系更有利于投资关系。尽管缺乏具体数据，但 Garcia Herrero 和 Xu（2019）发现，近几个季度流入中国的 FDI 约有 70% 来自香港，高于 2003 年的 35%。据认为，其中大部分来自香港以外的最终投资国（UIC）。

在中国海外投资普遍下滑的情况下（也影响了美国），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中国在欧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40%（Hanemann 等，2019）。对中国商务部出版物和贸发会议投资报告等其他来源的评论表明，由于中国加强了资本管制和国内信贷管理，加上欧盟主要国家实施了更严格的投资筛选程序，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总流出最近开始减少。

双向流动仍仅占中国和欧盟的总 FDI 的一小部分，2017 年中国对欧盟的 FDI 约占欧盟 FDI 的 4%，而反之，欧盟 FDI 仅占中国 FDI 的 5%。外国直接投资仅占欧盟国内总投资的一小部分，几乎可以不计，而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国内总投资所占的份额更小。从部门来看，在 2000 年代初期，制造业在中国对欧盟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占主导地位，但这一主导地位正在逐渐转向服务业。同时，中国已经大大增加了对战略领域的投资，特别是对技术的获取。这部分是由政策驱动的。最近证明，未经政府批准很难获得外汇资金，能否获得批准取决于拟进行的投资的战略价值。

在欧盟内部，德国是对华直接投资的最大提供者，荷兰和北欧（瑞典和丹麦加起来）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德国和荷兰也是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接受国，正如前文提到的，中国外国直接投资最近有所下降。这些双边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资金流显示出有误导性的情况。例如，流入和流出荷兰的外国直接投资受到大量特殊目的实体（SPE）的影响。特殊目的实体（SPE）是 FDI 通向其他国家的“导管”，而且更普遍地，在欧盟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导管改变方向的情况。

自 2014 年以来，中国在希腊、葡萄牙、中欧和东欧非欧元区国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克罗地亚，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外国直接投资从低基数开始大幅飙升。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所有这些国家都与中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2016 年，从美国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与从欧盟流入中国的相似，但美国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所获得的收益是欧盟的两倍。同样，应谨慎看待与双边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有关的统计数据。大多数流入和流出中国的外国直接投

资都是通过第三方进行的，特别是香港和新加坡，中国与它们有双边投资协议，而且各方的权利被更正式的确立和执行。

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2013年至2017年，中国在欧洲的投资获得了83亿欧元的回报，而欧盟在中国的投资获得了810亿欧元的回报。最大的受益者是德国、荷兰和法国。欧盟公司的投资回报率很高：2013年至2017年，欧盟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回报率为10.1%。该回报率高于欧盟在日本（8.9%），印度（7.2%），俄罗斯（6.8%）和美国（2.9%）等其他国家的投资。另一方面，在此期间，中国在欧盟的14个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回报率为4.2%，与在美国的投资回报没有显著差异。

2019年4月，新的外国投资筛选框架在欧盟生效，旨在提高流程的稳健性。筛选主要在成员国的层面进行，欧盟成员国拥有最终决定权。欧盟将对在中国在欧洲的商业行为进行更严格的审查，这将对未来在欧洲的中国投资者构成持续的挑战⁷。

5. 投资组合和银行业务流动

欧盟和中国之间的投资组合和银行业务流量相对较小。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说法，证券投资（PI）流量是指不能被视为直接投资（因为它们代表特定实体的权益少于10%）、储备资产的股权或债务工具的任何跨境交易。其他投资（OI）流量包括国际银行的借贷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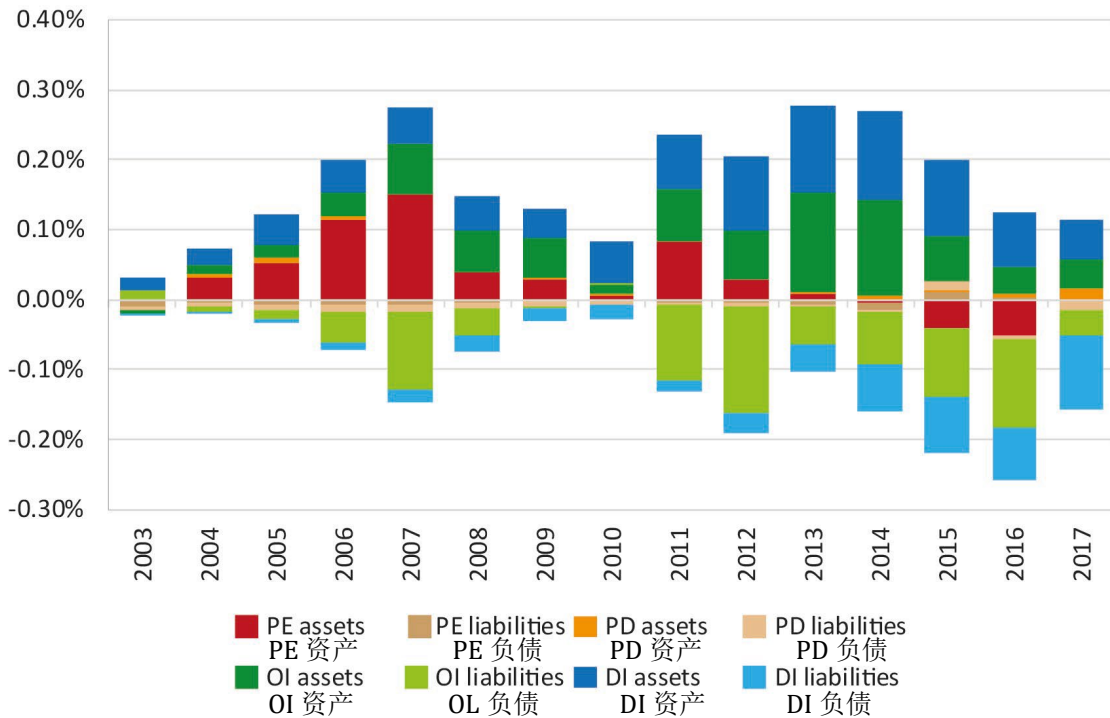
考虑到两个经济体的庞大规模，欧盟和中国之间的PI和OI流量仍然很小。欧盟在中国的股票PI和债务PI的总存量估计分别为1260亿欧元和230亿欧元。相比之下，欧盟在美国的股票PI和债务PI的存量分别为2.3万亿欧元和2万亿欧元。同时，欧盟在中国的OI存量为1540亿欧元，而在美国的OI则接近2万亿欧元。

考虑到这一点，与流量构成有关的几个有趣特征（图13）脱颖而出。首先，OI流量在2009年至2016年间稳步增长。这也代表了在2014至2016年，中国净资金流出的大幅增长（2015-16年度，OI净流出占中国GDP的4%以上）。这种平衡的变化如图13所示，显示了在此期间中国流入欧盟的OI量增加和欧盟流入中国的OI量下降。中国净流出量激增最初是由于外国人持有的中国资产减少所致。然后，中国居民持有的外国资产增加，加上2015年的人民币贬值刺激了更多的中国储蓄流出境外，使得这种情况得以维持（Claeys等，2017）。这种强劲的净流出在2017年已基本消退，导致OI总流量下降，如图13所示。这一下降是被外部贷款减少驱动的：经常账户的减少限制了美元融资，避险情绪正在

⁷ For details, see https://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9-2088_en.htm.

上升 (Richet, 2019)。从 2017 年开始, 为限制资金流出而采取的资本管制措施的影响更为有效。

图 13: 中国对欧盟总流入 (按类别, 占欧盟 GDP 百分比)



数据来源: Finflows (Nardo et al, 2017). Note: PE = portfolio equity, PD = portfolio debt, OI = other investment, DI = direct investment.

股权投资流量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在 2007 年, 从欧盟流入中国的资金是从中国流入欧盟的 30 倍以上。现在, 从中国到欧盟的流入更多。对此变化的部分解释是中国 2015 年的工业战略, 即“中国制造 2025” (MIC2025), 该战略促使中国购买了欧洲公司的战略股权。尽管大多数情况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进行的, 但对投资组合股票流量的某些影响也很明显。此外, 虽然证券债务在流量中所占的份额要小得多, 但其地理范围已扩展到金融中心和英国以外, 进入欧元区一些核心经济体 (德国, 法国, 意大利和荷兰) 的流量也在增加。

最后, 中国与非欧元区中欧和东欧国家 (保加利亚, 捷克共和国, 克罗地亚, 匈牙利, 波兰和罗马尼亚) 之间的流动变化引起了关注。由于来自中国的大量流入, 该组经济体与中国的双边净流出显著为负。自 2015 年以来, 所有这些国家都自 2012 年起成为 BRI 16 + 1 合作平台的一部分。尽管进入这些国家的流量从 2015 年才开始出现, 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是中国的投资核心, 因此这些国家从中国获得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一带一路其他投资流量的增长更为惊人。我们预计其中大多数将是银行资金流动⁸, 但文献中并未充分探讨中国

⁸ As pe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Finflows database:

在该地区银行业务的增长。

6. 人员流动

中欧之间的人员流动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签证要求繁琐并且对移民实行严格限制，但在过去十年中，此类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值得一提的是，就出境旅行和支出而言，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旅游市场，欧洲已成为中国游客人数第二的大洲（仅次于亚洲），吸引了中国出境游客的13%。

中国提出的申根签证申请数量（已批准超过95%）从2010年的825,511增至2018年的290万，年均增长12.37%。每周有600多趟航班往返欧洲和中国，2017年有600万中国游客到欧洲。中国和欧盟领导人为2018年“中欧旅游年”打上了烙印。接待中国游客最多的欧盟国家是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中国游客在许多欧洲城市创造了稳定的收入和就业机会。

欧盟居民可以通过免签证过境去往中国19个城市，可以停留长达72小时，或者可以申请中国旅游签证。2016年，欧盟公民到中国旅行的有210万，比2012年增长了16%。同年，到中国旅游外国人中来自欧洲的比例为17.3%，而来自亚洲的为67.5%，来自美国的为10.7%。在旅游服务上，欧盟对中国是净出口国：2016年，欧盟居民在中国的消费额接近30亿欧元，而中国游客来欧盟的消费近70亿欧元。

此外，欧盟最大的非欧盟学生群体来自中国。经济实惠的高等教育、大学合作伙伴关系以及中欧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使得在欧盟学校吸引了中国学生前来学习。2018年，有超过100,000名中国学生在英国学习，为英国经济创造了数百亿的收入⁹。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英国大学的中国申请者人数在2019年增长了30%¹⁰。德国（32,268人）和法国（28,760人）也是中国学生的首选目的地，也在类似的增长趋势中获益。

在中国学习的欧洲人较少。2016年，共有71,319名欧洲学生（其中30%是俄罗斯人）在中国学习。这仅占中国外国学生总数的16%。其中，有10,414名学生是法国人，其次是德国人（8,145），英国人（6,217）和意大利人（5,584）。

<https://ec.europa.eu/jrc/en/publication/finflowsdatabase-bilateral-financial-investment-stocks-and-flows> (Nardo et al, 2017).

⁹ Financial Express (2017) 'International students generate over 25 bn pounds to UK economy: Study', 6 March, available at <https://www.financialexpress.com/world-news/international-students-generate-over-25-bnpounds-to-uk-economy-study/577421/>.

¹⁰ Sally Weale (2019) 'Chinese students' applications to UK universities up by 30%', The Guardian, 11 July,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9/jul/11/chinese-students-applications-to-ukuniversities-up-by-30>.

除了这些短期交流外，中国移民在欧洲各地也长期存在。据估计，2011 年欧洲有 215 万中国移民¹¹，特别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接待了大批中国人。

重要的是要注意，并非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的所有中国旅行支出都采用实际购买旅行服务的形式。随着中国资本管制的加强，旅游业可能已成为资本外逃的渠道（Wong, 2017）。无法衡量这种现象的严重程度，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资本管制的加强，旅游业支出从 2013 年进口总额的 6.1% 增至 2016 年的 12.9%（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7. 中国，欧盟和美国

尽管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中欧之间有着广泛且不断发展的经济关系。但是，与欧盟和美国之间的交流强度相比，这些双边关系显得苍白。以市场汇率表示，中国是这三个国家中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尽管它是按购买力平价调整汇率后的最大经济体），深厚的欧美关系是长期存在的，而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直到 1980 年代才开始随中国的开放发展起来。但是，阻止中国与欧盟建立更深层次关系的障碍仍然远远高于欧盟与美国之间的障碍。

欧盟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反之亦然：两者之间的贸易在 2018 年达到 1.3 万亿美元。虽然商品贸易占了其中的大部分（8070 亿美元），但服务也很庞大，2018 年达到 4520 亿美元。两者之间的贸易是相当平衡的：欧盟与美国的商品贸易顺差为 1,090 亿美元，而美国与欧盟的服务贸易顺差为 600 亿美元。同时，中欧贸易和中美贸易各自价值约 7500 亿美元，比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额少 40%。此外，与中国的贸易主要为商品贸易。

阻碍中美之间的紧密联系的障碍与中欧之间类似：主要是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投资地点和方式的限制，来自国家的不正当竞争以及对私营部门的政治干预，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美国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煽起了火焰，自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已升级为一场贸易战。公开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安全问题加剧了紧张局势。

相比之下，欧盟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显得很稳定，但也并不容易。拟议中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甚至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就在大西洋两岸遭到了强烈反对。欧盟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摩擦的根源，美国对铝和钢征收关税、对汽车征收关税备受争议，同时也引出了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问题。特朗普政府对英国脱欧的支持也激怒了欧洲人。世贸组织正在对长期的贸易争端，特别是波音-空中客车案组织诉讼。美国继续在保护和补贴农业和高额汽车关税方面挑战欧洲。

¹¹ See Gui (2011) and <http://www.culturaldiplomacy.org/academy/index.php?chinese-diaspora>.

如果将来中国的体制和贸易保护水平更接近欧盟和美国贸易体系的要求，那么很难确定欧盟与中国之间（或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量能达到什么水平。欧洲中央银行的一项研究（Bussière 和 Schnatz，2006 年）使用贸易的引力模型表明，中国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国际市场，特别是在许多欧盟国家和北美（以及其他国家）中。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往来之所以如此紧密，部分原因在于美欧往来的贸易是产业内的贸易，从飞机到汽车零部件，从药品到金融和专业服务，贸易的发生都依赖于技能、技术和产品差异，而与从历史上看，中欧贸易则更多地依靠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因此，在 2017 年，中国的单向贸易占 81%，即跨行业贸易和进出口不属于同一类别的贸易，而美国和德国的单向贸易分别占 43% 和 39%（CEPII，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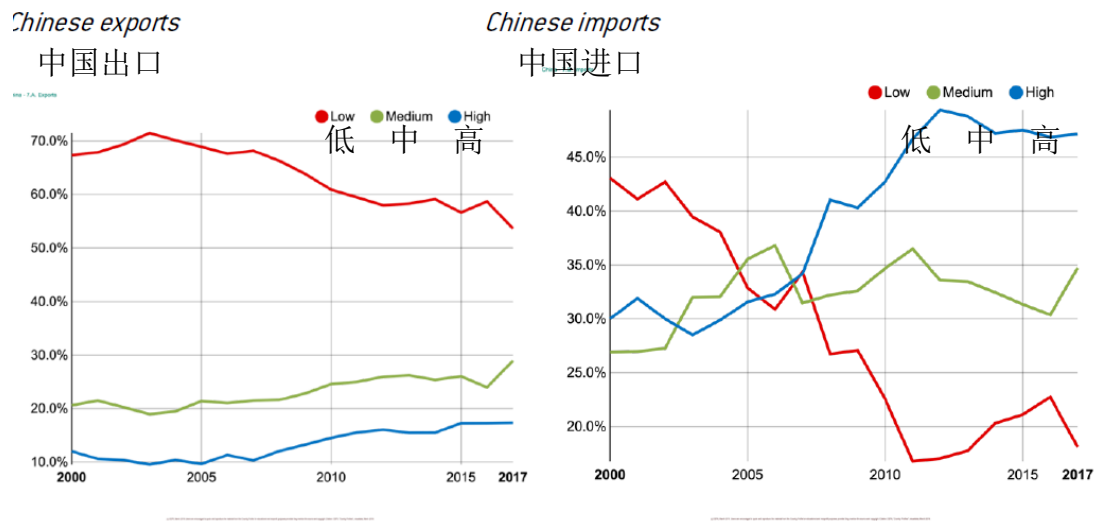
人们对中国出口量的增长给予了很多关注，但如图 14 所示，中国进口向高价值商品的转化更加明显（CEPII，2019）。这意味着，尽管中国在世界市场上与发达国家存在更直接的竞争，但中国也正因为其专业化产品和服务而变得更加重要。

总的来说，结论非常明显：如果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大幅降低，欧盟与中国（以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量可以更接近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消费者需要更多种类的商品，中国也将更多地从事产业内的贸易（而非跨行业和进出口不属于同一类别的单向贸易），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可能会达到欧盟与美国贸易的数量级。

当前的中欧和中美外国直接投资差距更大。2017 年，美国在欧盟的 FDI 存量接近 3 万亿美元，而欧盟在美国的 FDI 存量为 2.2 万亿美元。这是欧盟或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的十倍以上：分别为 1,960 亿美元和 1,010 亿美元。中国在欧美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甚至更少：中国在欧盟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为 820 亿美元，而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为 390 亿美元。话虽如此，这一 FDI 数字在近几年已大幅增长，2001 年欧盟在中国的 FDI 存量为 420 亿美元，而美国在中国的 FDI 存量为 120 亿美元。

图 14：中国制造业进出口分解（按单位取值范围，占总制造业货物进出口百分比）

2000-2017 年变化



数据来源：CEPII, CHELEM database

这些巨大差异如何解释？除了中国相对较晚开始外国直接投资外，还可以发现，不允许外国在中国投资的行业很多，并且还有一些行业，外国可以投资，但是要接受对合资企业技术转让的要求。美中之间没有双边投资条约，这意味着双方受到的保护（国民待遇和争端解决程序）要少得多。这促使美国公司通过其海外子公司进行投资。由于完全没有条约，通过香港进行投资对于美国公司可能比欧盟更重要。几乎可以肯定，这导致了美国对中国投资量被低估。

由于欧盟成员国与中国之间的长期投资协议，中欧之间没有双边投资条约（BIT）的问题较少。直到最近，中国对欧盟和美国的直接投资可能一直受到中国各种形式的资本管制的阻碍。此外，中国公司严重依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变），他们在高收入国家建立生产的动机可能受到限制。如果壁垒较低，那么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中欧之间（以及中美之间）的双向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大大增加。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涨和中国消费者对品种的更多需求，欧盟与中国之间的 FDI 双向流动很可能会增加。

8. 制度框架

尽管作为贸易伙伴中欧都很重要，但管理中欧双边贸易的制度仍然有限。中欧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协定，而目前开始此类谈判的可能性很小。如前所述，一些欧盟成员国很早就与中国缔结了投资条约，但这些条约旨在为投资者提供国民待遇和司法补救（即保护），并且不包括市场准入条款。目前有权进行投资谈判的欧盟正在与中国就一项深入而全面的投资条约进行谈判，该条约旨在涵盖市场准入和合资企业要求等问题，但事实证明，这些谈判是缓慢而困难的。双方最近承

诺在 2020 年底之前达成协议。

专栏 1：欧盟可以从中国-瑞士贸易协定中学到什么

中国是瑞士工业产品的第三大买家，仅次于欧盟和美国。经过四年的磋商和两年的谈判，中瑞两国于 2013 年 7 月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

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几乎立刻或者仅在一小段过渡时期之后，全部或部分取消了几几乎所有商品的关税。该协议是全面的。例如，它完善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服务学科，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并建立了明确的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措施和政府采购的透明度。它还提供了一种监视和合作机制，可以改善协议，包括提供争端解决机制。

尽管自贸协定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中瑞之间的互惠贸易关系，但它也促进了在科学，创新，研究，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2014 年 7 月，中国人民银行与瑞士国家银行还建立了一项为期三年的货币互换协议，而 2015 年 1 月，苏黎世被指定为少数几个人民币交易中心的世界城市之一。

贸易量和指标数据显示了自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来，瑞士和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是如何加深的。瑞士对华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从 2013 年的 5.8% 增加到 2017 年的 8.2%。瑞士与中国的贸易强度指数（该指数给具备世界贸易平均水平的国家赋值 100 分）从 2013 年为 71，而 2018 年为 93。但是，瑞士对中国的出口波动很大，因为黄金和珠宝出口约占瑞士对中国出口的一半。自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来，药品占瑞士 2017 年对中国出口的 16%，年均快速增长 22%。有趣的是，自 FTA 实施以来，中国对瑞士的出口并未显著增长。2017 年，中国对瑞士的五大出口产品（包括化学，机械和服装）占中国对瑞士出口总额的 62% 以上，并且在 2013 年至 2017 年之间仅以每年 1.8% 的速度增长。贸易强度指数同样保持非常低的水平没有变化，约为 9.3。

瑞士在外交政策上的不结盟显然促进了与中国的紧密联系。中国对瑞士的开放是渗透欧洲市场的战略的一部分，而瑞士一直渴望优先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先于欧盟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支持该协议的瑞士人形容该交易是自 1972 年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以来最重要的协议。尽管瑞士和欧盟一样存在一些争论点，尤其是在侵犯人权和劳工做法方面，但瑞士人采取了务实的态度。例如，瑞士人坚持要在协议中涵盖一项双边劳工和就业协定，以解决他们关切的一些问题。

讨论中欧之间的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超出了本文范围，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部分解释了中欧之间为何缺乏管理经济关系的制度框架。但是，很显然，即使欧盟没有与中国进行全球大国之间的竞争，中美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美国是欧洲的历史盟友，使中欧关系更加复杂。欧盟委员会在 2019 年 3 月的一次通讯中

称中国为“促进替代治理模式的系统竞争对手”（欧洲委员会和高级代表，2019年）。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管理中国与16个中欧、东欧国家（其中11个是欧盟成员国）之间的BRI合作的16+1框架就是很好的例子。Baltensperger和Dadush（2019）论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潜在利益和局限性，而欧洲议会研究服务局（EPRS，2017）的最新论文得出的结论是，该倡议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并未形成有利于建立紧密联系的机构（正式和非正式）。人们对中国在欧洲的一些基础设施投资的地缘战略影响提出了许多疑问。中国对欧洲8个主要海港的股份的收购（超过三分之二的欧洲货物通过海运到达），包括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35年租约¹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除了地缘政治问题外，深化欧中关系还存在其他系统性或准系统性障碍，而这些障碍往往助长了紧张局势。障碍源于中国与众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国家对各方面事务的强大影响。当根据国际自由体系的规范和明确规则进行分析时，中国的这些特征被认为是造成了不公平，这些行为使中国在全球市场上获得了人为的竞争优势。2018年，在未明确提及中国的情况下，欧盟、美国和日本贸易部长制定了旨在按照世贸组织改革框架处理这些问题的三边框架¹³。世贸组织改革提出了各种建议以促进中国的融合（Mavroidis and Sapir，2019）。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将逐步改革经济结构，以更好地符合西方标准和国际规则体系的标准。就是说，一些严肃的批评家认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认为中国可能会对全球的贸易方式造成重大损害（例如，Hufbauer，1998）。尽管在2000年代初，中国进行了一些市场导向的改革（这有助于深化贸易和投资关系），但总体共识是，中国无意在许多领域采用西方做法，而且最近有相反的趋势。

欧盟中国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2018年有20%的受访公司被迫同意技术转让（2017年为10%）。战略性行业受到的影响更大（化学和石油公司占30%，医疗公司占28%，制药公司占27%）。此外，标准普尔全球评级（S&P Global Ratings）显示，中国严重依赖外国技术，其中超过50%的技术部门供应商来自海外。此外，尽管中欧有在知识产权事务上的海关合作行动计划¹⁴，欧盟在其边

¹² Pandya and Tagliapietra (2018) reported that the Greek port's profits reportedly rose by 147 percent in 2018, while many foreign companies, including HP and Sony, set-up distribution centres there

¹³ See

https://eeas.europa.eu/regions/asia/51178/joint-statement-trilateral-meeting-trade-ministers-unitedstates-japan-and-european-union_en.

¹⁴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business/customs-controls/counterfeit-piracy-other-iprviolations/eu-china-co-operation-ipr_en.

境进行海关检查的年度报告显示，中国仍是侵犯知识产权最多的经济体。此外，欧盟已向 WTO 投诉，称中国的 TIER（技术进出口法规）不符合 WTO 的 TRIPs 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¹⁵。这些各种各样的担忧与中国的技术竞争有关，并且，这种竞争预计将会加剧¹⁶。

二十多年前，观察家指出，国有企业（SOE）可能对国际贸易造成损害。尽管国有企业遍布世界各地，但中国的国有企业规模足以扭曲国际市场。中国的国有企业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国政府的战略目标，而不是仅仅或主要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数量已大大减少，尽管这可能使得剩下的国有企业的更大更强（Garcia-Herrero and Xu, 2017）。

中国私营企业通过提供直接和间接利益来增加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是由于中国民营企业获得国家支持而造成的。这些目的通常也具有战略意义。中国显然希望在五年计划中确定的关键行业发展国家领军企业。目前，技术起着更大的作用，而制造业则占主导地位。这种补贴通常是不透明的，很难从外部进行评估。补贴包括优惠许可证，间接提供廉价信贷，甚至鼓励并购。2019 年 4 月的中欧峰会解决了这一问题，并建立了关于解决国家援助造成的扭曲和不正当竞争的合作备忘录，还强调了遵守这方面世贸组织规则的必要性¹⁷。最后，中国较低的环境和劳工标准既给欧盟带来了道德困境，也带来了经济困境。这是反对全面贸易协定的普遍理由，因为欧盟将进口那些劣等的产品，并因中国标准与欧洲标准的差异而为中国提供竞争优势。此外，据欧洲公司称，即使在中国经营，中国环境法规也会有选择地执行，以歧视外国企业（中国欧盟商会，2017 年）。然而，中国最近加强了对气候的关注，2015 年生效的《环境保护法》大大改善了之前的法规。中国还签署了八项重要的国际劳工组织公约。最后，欧盟已将确保提高环境和劳工标准作为与中国达成投资协议的目标之一。

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出，许多欧盟和美国公司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方面都表现出色。鉴于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非常严峻，因此有必要考虑 2019 年美国美国商会在中国的调查结果（美国商会中国，2019 年）。调查发现，企业正在以各种方式适应关税和紧张局势，但很少有人考虑退出中国市场。当被问及他们最希望进行中的贸易谈判时，有 43% 的企业只希望恢复现状。只有约 10%

¹⁵ See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8/june/tradoc_156910.pdf

¹⁶ MERICS (Shi-Kupfer and Ohlberg, 2019) address China's path to becoming global leader in digital technology, facilitated by coordination and ambitious government policy. The authors highlight the loss of European competitiveness in this field, heightened by Chinese takeover of European companies. They further point out possible security risks and call on the EU and member state governments to promptly focus on the integration and strength of the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¹⁷ See https://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9-2055_en.htm.

的人提到希望获得更公平的待遇或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只有 7% 的人把终止扭曲市场的补贴视为主要问题。很少有企业支持征收关税，而 75% 的受访企业表示关税损害了其业务。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美国的向中国出口的出口商和中国的进口商也反对关税。如今，相对而言，很少美国经济部门（例如太阳能电池板和钢铁，受到各种贸易救济措施的保护）直接与中国竞争。

9. 总结

中欧之间存在大量未开发的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的机会，而随着中国越来越重要，这些机会可能会增加。由于欧盟处于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与中国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机会，以及中国可以间接提供给欧洲其他传统市场的推动作用，都不能被忽视。同时，欧盟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必须尽可能建立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或者说采用术语，欧盟的目标应该是接近“竞争中立”。

在此前提下，欧盟应提高与中国建立更紧密联系的雄心。这将需要欧盟更加努力，来了解中国，来在内部协调欧盟的对华策略，并确定优先行动清单和策略清单。在商定期限之前，结束涵盖市场准入条款的双边投资条约的谈判将是重要的一步。欧盟最近与包括加拿大，日本以及原则上的南方共同市场的主要伙伴缔结了贸易协定。至少在过去六年中，欧盟还一直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断断续续的谈判，在此期间，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的 15 轮谈判结束了。

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进行了深入的谈判，涉及贸易和投资关系以及中国经济的改革。现在是时候考虑中欧经济贸易协定的样子了，不是要进行谈判，而是要启动分析工作和双方专家之间的交流。世贸组织作为国际贸易总体组织框架的能否继续存在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一情况下，考虑中欧经济贸易协定作为一种保险形式尤其重要（Dadush 和 Wolff, 2019 年）。通过对中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态度，欧盟整体将比单个欧盟成员国承担更大的谈判压力，通过采取协调一致的态度，可以避免在不同成员国走不同道路时可能发生的冲突。

本文原题为“[The state of China-European Union economic relations](#)”。本文作者 Uri Dadush (uri.dadush@bruegel.org) 是 Bruegel 的非常驻研究员和 the Policy Center for the New South 的高级研究员。Marta Domínguez-Jiménez (marta.dominguez@bruegel.org) 是 Bruegel 的研究助理。Tianlang Gao 是 Bruegel 的一名研究实习生。我们感谢 Maria Demertzis, Alicia Garcia-Herrero, Niclas Poitiers 和 Guntram Wolff 提出了非常有用的意见，感谢 Sarah Saboorian 提供了研究帮助。本文于 2019 年 11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美贸易协定将带来哪些溢出效应？

Eugenio Cerutti, Shan Chen, Pragyana Deb, Albe Gjonbalaj, Swarnali A. Hannan, and Adil

Mohammad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中美旷日持久的贸易战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两国能否最终达成协议？达成协议后，第三国将会受到怎样的冲击？IMF 的多名经济学家对可能达成的贸易协定做了综合分析，并计算了协议在短期内可能带来的溢出效应。编译如下：

1. 引言

截至 2019 年 8 月，备受瞩目的中美经贸谈判仍在继续。自 2018 年起，美方对中国商品多次加征关税，而中方也多次基于对等原则对美国商品征收了惩罚性关税。在去年年末，中美贸易战曾短暂进入休战期。但到 2019 年 5 月，随着美国再度对中方加征关税，贸易战又进入了新的阶段。到目前为止，双方又各自对对方征收了惩罚性关税。而与此同时，也不断有消息指出，中美即将达成初步的贸易协定，缓和双方在贸易领域的紧张局势。

一旦中美达成贸易协定，全球经济都将随之受益——届时，关税水平将会下降，政策不确定性将会减小，金融市场的状况将会改善，而贸易和投资壁垒也将因结构性改革而降低。除此之外，潜在的中美贸易协定还将造成其他影响，其中最令人关注的一点，是现存的部分中美双边贸易将向第三国发生转移，而这无疑将改变现有的国际劳动分工。

在本文中，笔者使用三种方法考察了潜在的中美贸易协定将带来的直接溢出效应。为了确定可能受到影响的第三国，笔者假设了一种场景：即贸易协定将包含某种条款，使得中美双边贸易赤字在短时间内降低至接近零的水平。具体来说，我们假设中国将在不增加总进口的前提下，提高来自美国的进口份额。换言之，中国在从美国增加进口的同时，将降低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作为补偿。由于对协定细节知之甚少，我们在本文中将分别基于不同假设，采用不同方法来预测贸易协定对国际贸易带来的冲击效果。在下文中，笔者用“出口转移”来指代那些原本由第三国指向中国，但在协定达成后可能转而由美国指向中国的出口行为。

我们共使用三种模型假设：（1）规模假设（size-based approach）——考虑到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很难在一夜间发生改变，我们假设中国将首先提高当前从美国进口的前十大类商品（使用两位数 HS 代码）的进口总量。而对于这十类商品而言，其分别增加的采购量将与其各自潜在的增量空间成比例。此外，我们还分别考虑了每种商品对应的前十大出口国，从而预测其溢出效应；（2）递进假设（cascading approach）——在这种假设中，我们考虑更细的商品分类（使用六位数产品代码），并考虑同时与中美存在贸易往来的所有国家（而非十大类商品各

自对应的前十大出口国)。对于这些商品,贸易协定的冲击在时间上存在递进关系。首当其冲的是大宗商品,之后发生出口转移的是制成品,而对于其他一些商品(如民航客机)而言,由于合同和制造周期的影响,其发生出口转移的时间是最晚的。也就是说,我们假设大宗商品的替代性最强,工业制成品次之,而类似于飞机这样周期较长的产品则最弱。因此,在这种假设下,贸易协定的溢出效应在时间上也将具有递进性,第三国受影响的程度与其出口结构有关;(3)混合假设(hybrid approach)——我们对前两种假设进行结合,使用两位数代码确定受协定冲击的行业,并在行业内部使用六位数代码,研究全球超过200个经济体相互的双边贸易数据。与之前类似,我们基于现有的中美贸易结构,确定各两位数级别行业的进口增量。之后,我们再基于更精确的六位数产品代码计算各国受到的溢出效应大小。

未来的贸易协定将通过出口转移对哪些国家带来影响?这取决于中国将具体承诺增加哪些商品的采购。无论基于哪种假设,我们都发现,包括欧盟、日本、韩国在内的大型经济体将受到更大波及,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出口中包含更多的汽车、机械及电子产品。但是,就溢出效应的规模来讲,我们基于三条假设得出了三种不同结果。这种结果的差异意味着,溢出效应的具体大小将取决于中国在哪些行业增加更多进口份额。此外,基于第二种假设推测的结果也显示,对于那些向中国出口更多大宗商品的小国来说,他们面临的潜在风险要更大一些。

我们的发现印证了现有文献,但我们使用的数据更加细致,假设更加丰富,而关注的效应也更加具体。目前已有许多文献关注类似的问题:Caceres, Cerdeiro, and Mano (2019)测算了贸易协定的长期影响,他们认为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第三国在中美交易较为密集的行业的市场份额。Zhu, Zhou, and Chang (2019)考察了两种可能的协议模式,并发现欧盟、日本、东盟国家、韩国、巴西及中国台湾省将受到较大影响。除了出口转移,贸易协定对全球价值链(GVC)的干扰也可能给第三国带来溢出效应。IMF报告表明,受2018年中美关税大战的影响,全球贸易及生产活动出现下行趋势,投资及经营情绪受到负面影响。而2019年5月以来双方进一步提高的关税,以及贸易战向其他领域(包括科技,国家安全和汇率问题)的蔓延现象,都使得情况更加恶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意识到贸易协定可能从多个渠道(如GVC)带来溢出效应,但本文并未讨论这些额外的渠道。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三、四章分别展示基于三种假设计算的结果;第五章对这三套结果进行比较;第六章总结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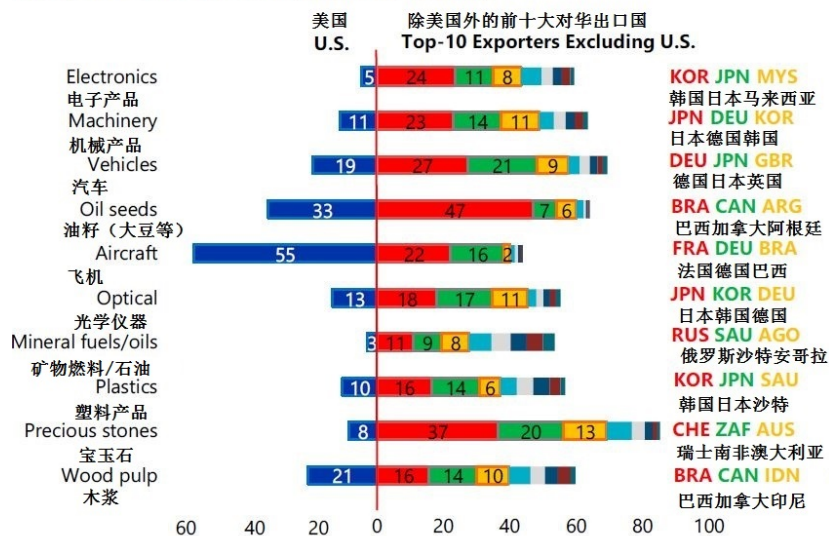
2. 基于规模假设的测算

在这种假设下,出口转移带来的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中国将在哪些行业

增加对美进口。例如，图 1 展示了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前十大类商品——左手边自上而下按进口总量排序（最大的是电子产品，而最小的则是木质纸浆），而右手边则是这些产品对应的对中国出口最多的其他十个国家所占份额。从直觉来说，这些国家是最可能受到出口转移效应影响的。举例来说，一旦中国增加从美国进口的大豆数量，那么巴西、加拿大和阿根廷等国将会受损；而进口更多美国汽车则会影响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国。

图 1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主要商品及其他来源国分布

Figure 1: China's Import Structure for Top Products Imported from U.S.
(2017; Share of China's total imports of each produ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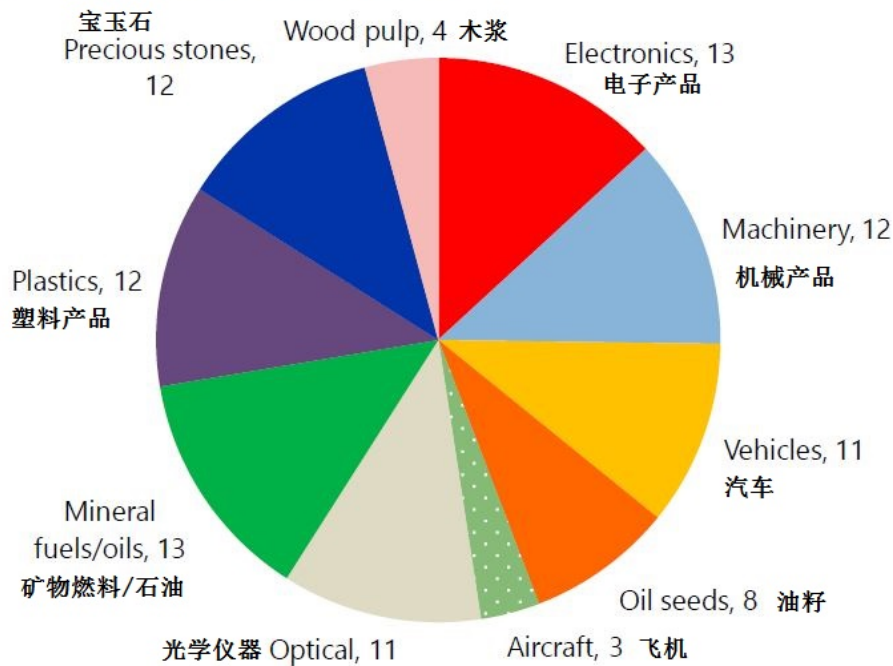


那么，中国的新增进口将在这些商品间如何分配呢？截止 2017 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规模约为 3370 亿美元。根据我们的测算，假设中国将通过加大采购的方式消除这些顺差，那么这些采购的分布情况将如图 2 所示。我们测算的依据如下：首先，由于中美两国的企业不太可能在一夜间建立起全新的贸易联系，因此我们假设中国的新增采购将主要集中于现存的贸易关系中。相应地，我们主要考虑中国目前从美国进口的前十大类商品；其次，对这些商品而言，我们假设新增的采购数量将与目前存量成正比；最后，我们假设每种商品的新增进口不能超过一定限额——即在增加进口后，中国对每种商品的进口总量不能超出目前来自所有国家的该商品进口总量。根据我们的测算，前十大类商品的新增进口不会超出当前美国国内的对应产量，因而我们的假设是较为合理的。

图 2 中国将增加哪些产品的进口？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Extra Purchases

(Share of total extra purchase, In percent)



贸易协定一旦达成，哪些国家会受到影响？针对前文定义的十大类商品，我们分别考虑除美国外的前十大进口国。之后，我们基于这些国家目前对华出口的对应商品的数量，成比例地计算其对应的出口转移规模。也就是说，那些对中国出口更多相应产品的国家，将受到更大的出口转移效应的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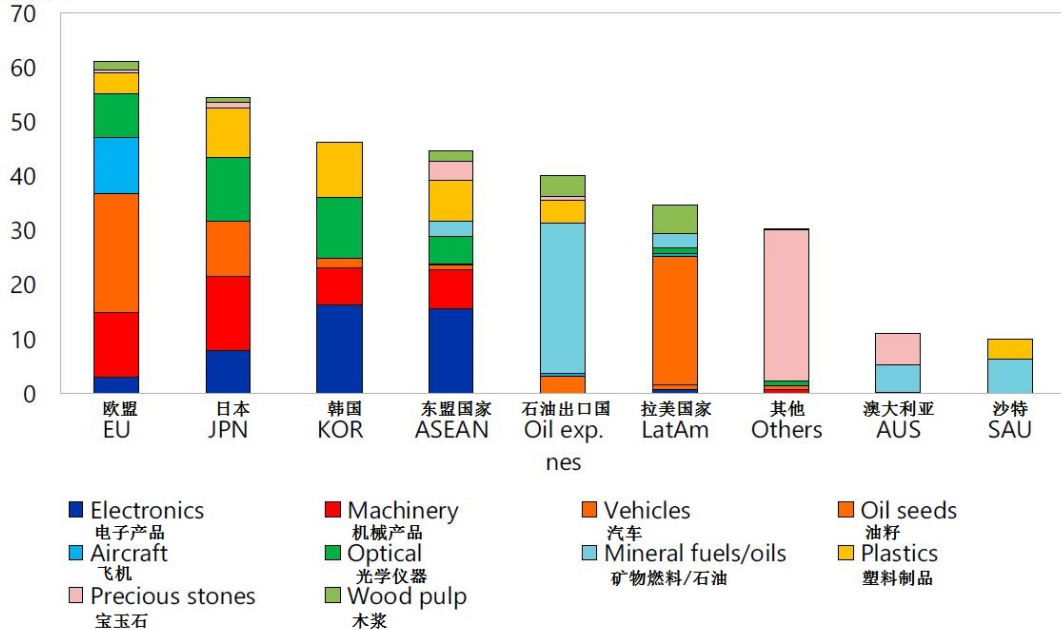
我们认为，受贸易协定影响最大的前三大经济体分别为欧盟、日本和韩国（见图 3）。具体数值为：欧盟 610 亿美元，主要受冲击商品为汽车、机械和飞机；日本 540 亿美元，主要受冲击商品为机械、汽车和电子产品；韩国 460 亿美元，主要受冲击商品为机械、光学仪器、塑料制品；东盟国家 450 亿美元，主要受冲击商品为电子产品、塑料制品、机械。此外，中国在石油和大豆方面的主要贸易伙伴也将受到较大影响。

图 3 出口转移的规模估算（绝对效应）

Figure 3: Export Diversion

In billions of US doll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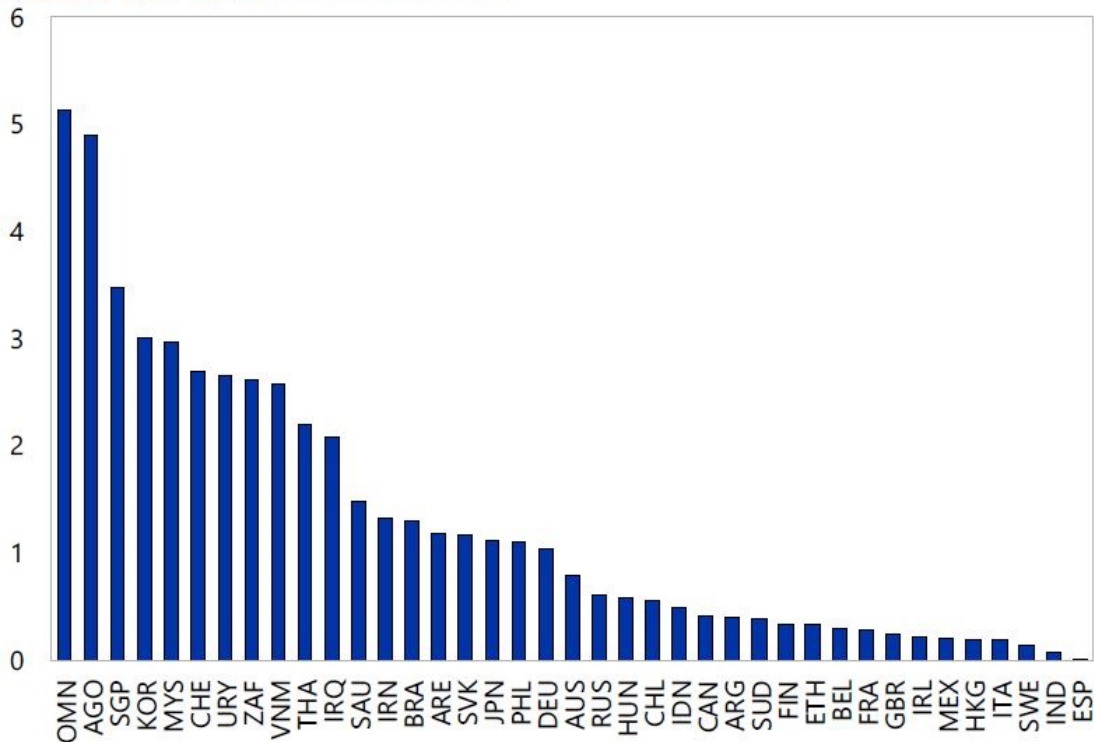
十亿美元



就受影响的国家来说，笔者在图 4 中列举了出口转移效应占各国 GDP 的比重，其中阿曼、安哥拉、新加坡和韩国都超过了 3%。显然，经济体量较小的石油出口国受到的相对冲击最大，而一些以制造业出口而闻名的东盟国家（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受到的影响也超过了 GDP 的 2%。尽管受影响的绝对数值较大，但由于其本身庞大的经济规模，日本和德国面临的相对冲击较小，约为 1%。此外，由于大豆所占的出口比例较高，巴西 GDP 的 1.3% 也将受到影响。

图 4 出口转移的规模估算（相对效应）

Figure 4: Export Diversion,
(Share of 2017 GDP) (占2017年GDP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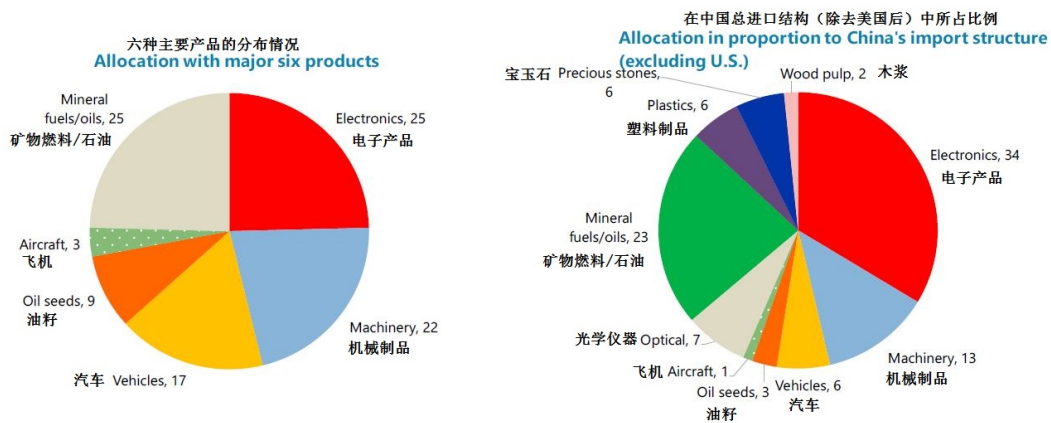


从左至右：阿曼、安哥拉、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瑞士、乌拉圭、南非、越南、泰国、伊拉克、沙特、伊朗、巴西、阿联酋、斯洛伐克、日本、菲律宾、德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匈牙利、智利、印尼、加拿大、阿根廷、苏丹、芬兰、埃塞俄比亚、比利时、法国、英国、爱尔兰、墨西哥、中国香港、意大利、瑞典、印度、西班牙

在图 5 中，笔者考虑了两种不同的场景：一是我们进一步缩小范围，假设中国将仅增加六大类商品的进口（如图 5 左侧所示）；二是假设中国将依照除美国外的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结构，选出前十大类商品并增加进口（如图 5 右侧所示）。

图 5 中国将增加哪些产品的进口？

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Extra Purchases
(Share of total extra purchases, In perc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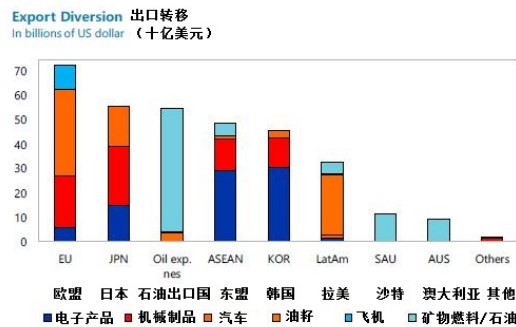
在第一种场景中，受到影响最大的经济体将分别为德国、日本和东盟国家。此外，与之前类似，石油出口国将受到更大的相对影响。至于第二种场景，东盟国家和韩国将受到最大影响。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认为第二种场景发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见图6）

图6 协定在不同场景下的影响

Figure 6. Results from Alternative Scenarios of the Trade De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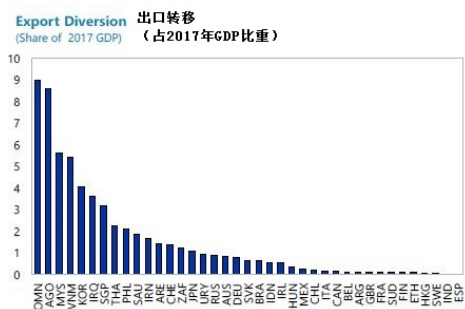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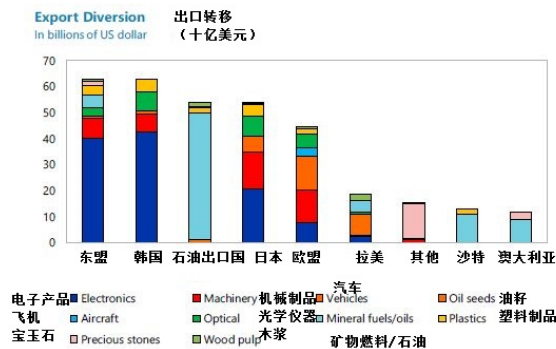
Distribution of extra purchases using major six products

六种主要商品在额外进口中的分布情况



Distribution of extra purchases in proportion to China's import structure (excluding the U.S.)

在中国总进口结构（除去美国后）中所占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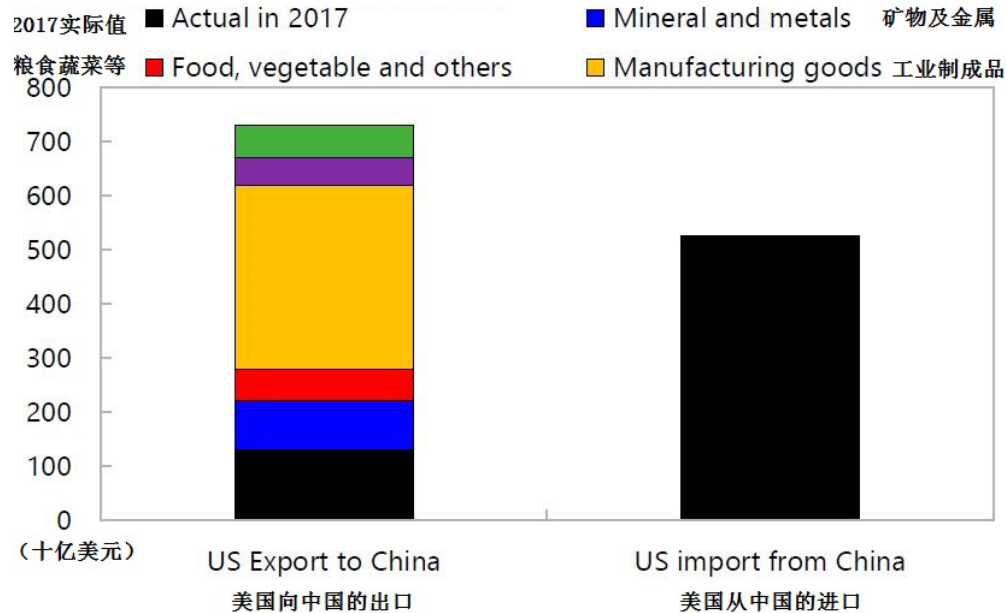
3. 基于递进假设的测算

在这种假设中，我们考虑更细的商品分类（使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的六位标准 HS 代码），并考虑与中美存在贸易往来的所有国家，从而能够更精确地评估国别间的溢出效应。简单来说，我们假设不同商品的出口转移存在一种递进关系——即中国将优先增加大宗商品的进口，之后是工业制成品，而最后才是类似于飞机这样合同及交付周期较长的产品。基于这种假设，我们设定中国将逐一从美国增加这些商品的进口量，直至中美贸易顺差归零为止。此外，我们假设美国各商品未来对中国的出口总额不超出这种商品在 2017 年对应的对外出口总量，且各商品产能维持 2017 年水平不变。

基于这种假设我们发现，那些自身经济体量较小，且与中国存在较多贸易往来的大宗商品出口国将受到较大冲击。如图 7 所示，2017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

货物总量为 1300 亿美元，而同年中国对美出口的货物约为 5260 亿美元，其顺差规模约为 4000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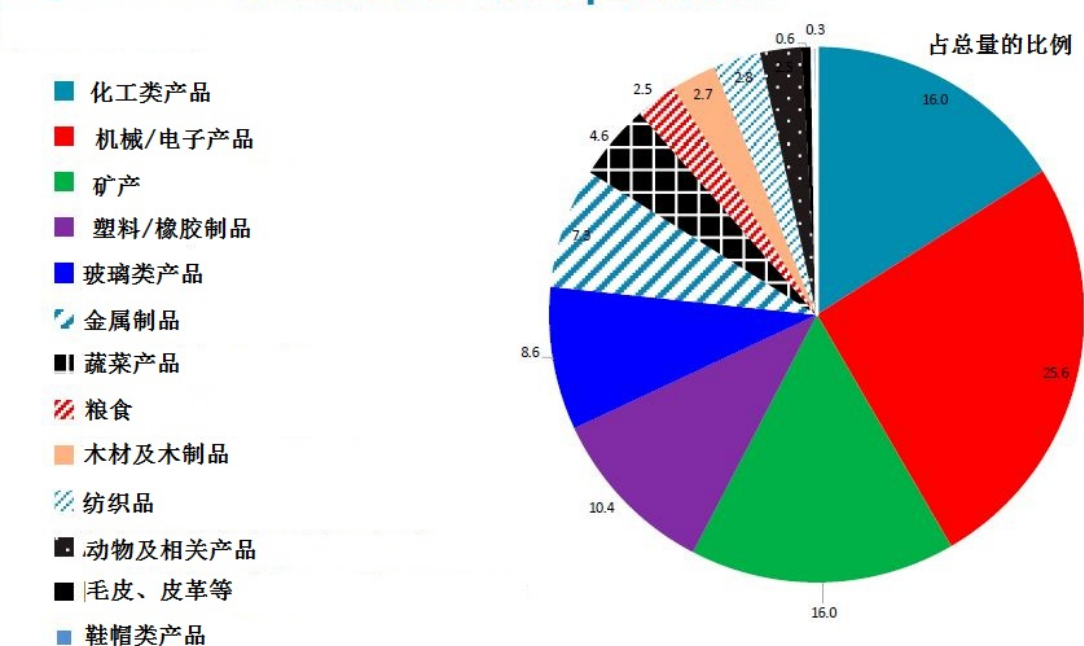
图 7 美国能够向中国额外出口哪些商品？



根据测算，我们估计在协定达成后，美国有规模高达 6000 亿美元的商品具备向中国出口的条件。根据之前的递进顺序我们发现，为了消除 4000 亿美元的逆差，美国目前对外出口的全部大宗商品及部分工业制成品都将被出口至中国。在图 8 中，我们具体展示了这些商品的分布情况。

图 8 中国将增加哪些产品的进口？

Figure 8: Distribution of Extra purcha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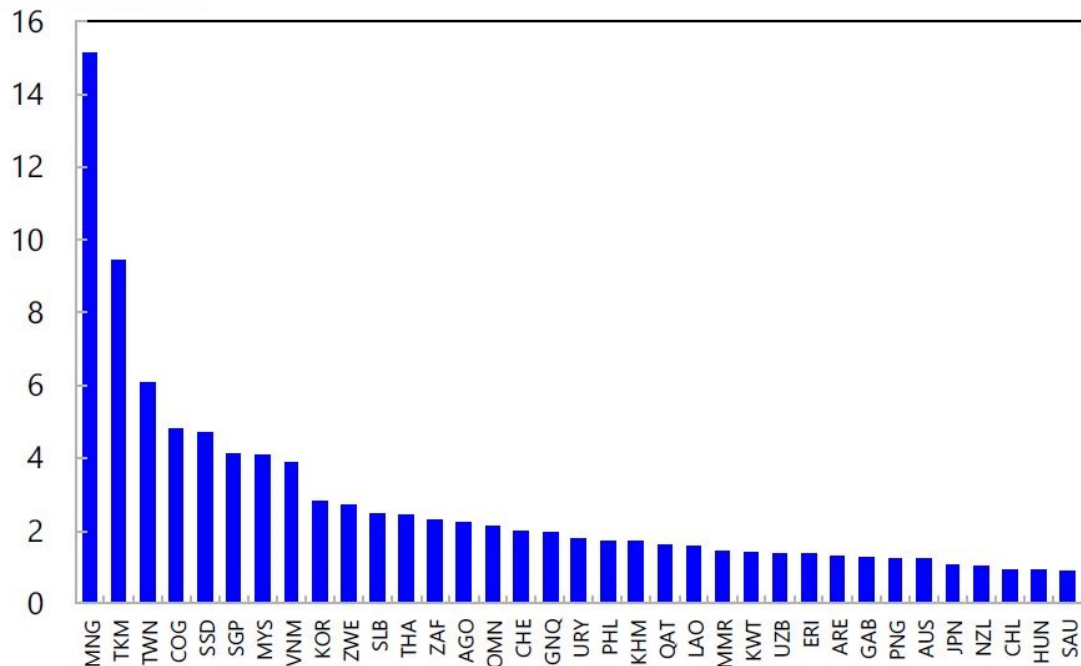


最后，在图9中我们展示了贸易协定对其他国家带来的相对溢出效应。在这些国家中，与中国往来密切的资源出口国受冲击最大，典型的例子包括蒙古（煤矿、铜矿），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石油）和部分非洲国家。此外，一些东亚经济体（包括中国台湾、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韩国和泰国）虽然出口结构较为多元，但由于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其受到的相对冲击也会较大。最后，我们使用2016年数据做了稳健性检验，得到的结果与使用2017年数据的版本基本一致。

图9 出口转移的规模估算（绝对效应）

Figure 9: Export Diversion

占2017年GDP的比重



从左至右：蒙古、土库曼斯坦、中国台湾、刚果、南苏丹、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韩国、津巴布韦、所罗门群岛、泰国、南非、安哥拉、阿曼、瑞士、赤道几内亚、乌拉圭、菲律宾、柬埔寨、卡塔尔、老挝、缅甸、科威特、乌兹别克斯坦、厄立特里亚、阿联酋、加蓬、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智利、匈牙利、沙特

4. 基于混合假设的测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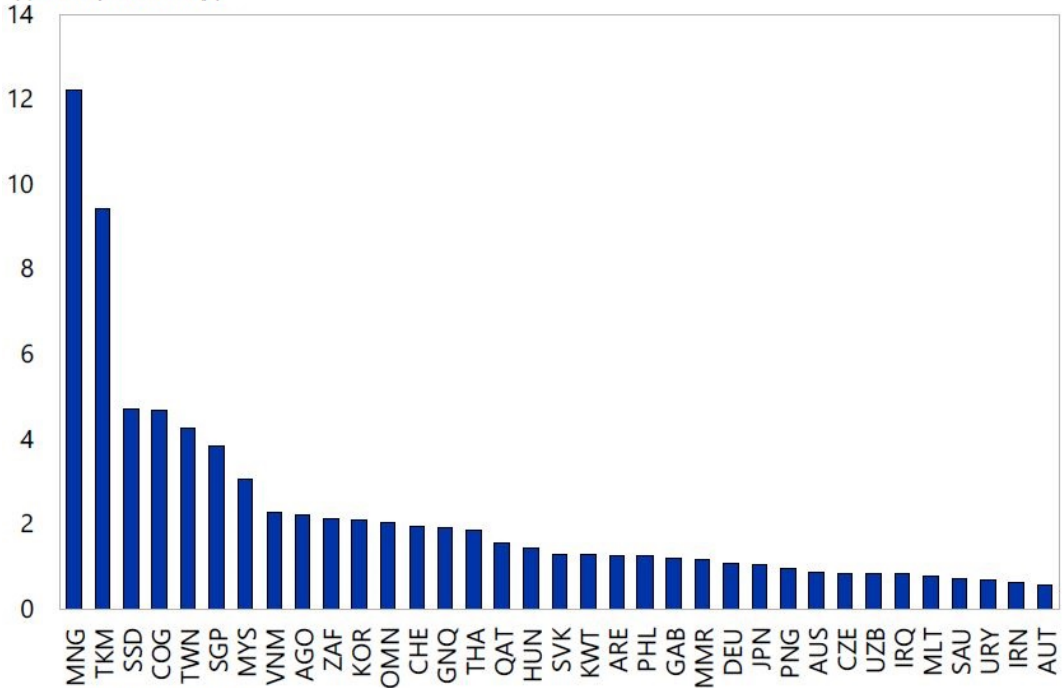
在前两节内容中，我们使用两种不同假设计算了贸易协定对其他国家带来的溢出效应。其中，有许多国家同时出现在了两种假设的预测结果中，但其具体受冲击的程度在两种假设下有所不同。在本节中，我们采用混合假设，即考虑前十大商品门类（类似第一种假设），但使用六位数产品代码，并将200多个经济体纳入考虑范围（类似第二种假设）。在基于前十大商品门类计算出口转移的规模时，我们规定中国增加的某种商品的进口量不得超出：（1）当前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这种商品的数量；（2）当前美国向其他国家出口的这种商品的数量。在确定了各门类商品出口转移的总规模后，我们进而采用第二种假设的做法，递

进地在该门类商品中分配各产品（六位数商品代码级别）的进口增加量。

图 10 出口转移的规模估算（相对效应）

Figure 10: Export Diversion,

占2017年GDP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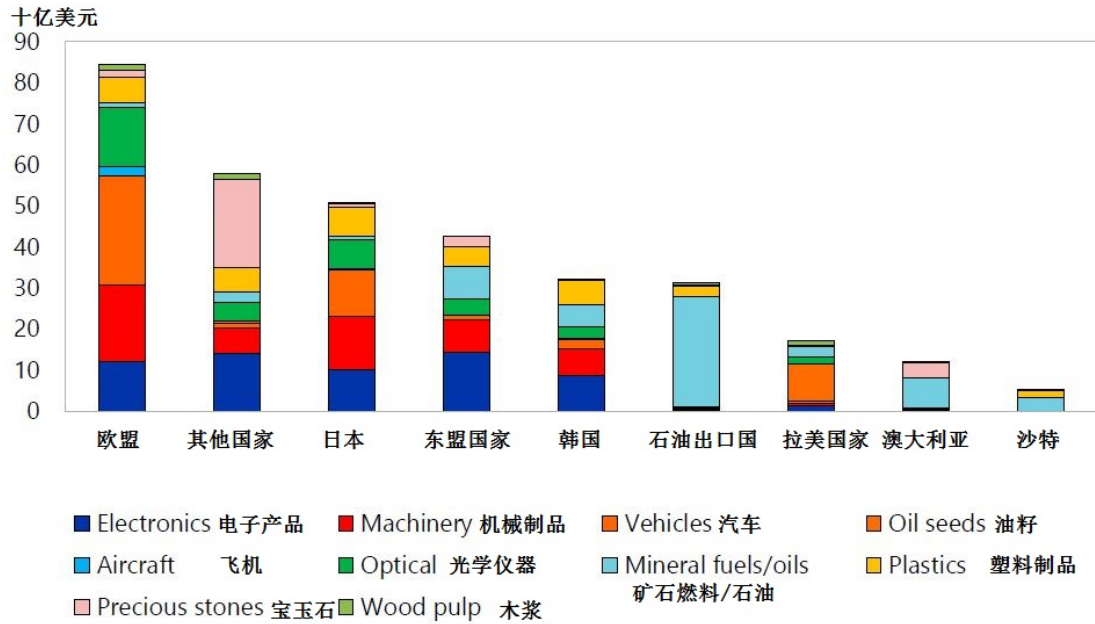


（图例如上图所示）

在这种场景下，除了与中国贸易往来频繁的国家外，其他一些小国也可能因为依赖大宗商品出口而受到较大冲击（见图 10）。例如，在混合假设下，我们估计蒙古和土库曼斯坦受到的相对冲击分别高达其 GDP 的 12.2% 和 9.4%。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估算只反映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但在现实世界里，由于合同及其他因素的制约，这么大的冲击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此外，由于机械及电子产品在出口中占比较高，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也将受到较大影响，规模约为 GDP 的 2% 到 4%。作为汽车及工业制成品出口大国，德国将受到约为 GDP 总量 1% 的相对冲击。总体来看，欧洲各国的出口总量可能下滑超过 840 亿美元（见图 11）。

图 11 出口转移的规模估算（绝对效应）

Figure 11: Export Diver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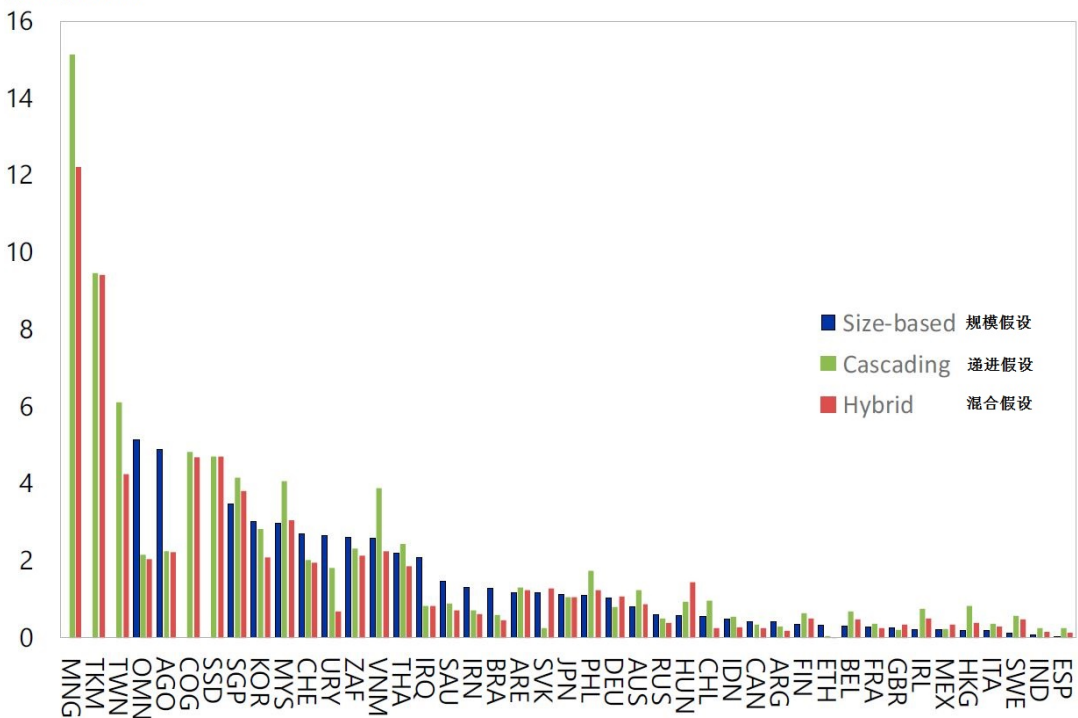
5. 三种测算结果的对比

无论采用哪种假设，我们发现出口转移效应都将对同一批国家造成负面影响，但这种效应的具体规模有所差异。在图 12 中，笔者展示了三种假设各自对应的估算结果。

图 12 三种假设下的结果对比

Figure 12: Export Diversion using Three Approaches,

占2017年GDP比重



(图例如上图所示)

对几个典型的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来说，无论采用那种假设，他们受到的相对冲击都在 GDP 总量的 1% 左右。但对于瑞士和韩国而言，他们遭受的冲击要更大一些，约占 GDP 的 2% 至 3%。相比之下，许多亚洲国家都将遭受较大影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面临的相对冲击为 3-4%，越南为 2-4%，而泰国约为 GDP 的 2%。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差异较大，南非受到的冲击约为 GDP 的 2-3%，而俄罗斯和印尼受到的影响则都相当有限——不到 GDP 总量的 0.6%。

比较来说，基于规模假设和混合假设得出的两种估计结果相差不大——在两种假设所指出的 39 个国家中，有 35 个国家受到的相对冲击相差不到 1 个百分点，而有 8 个国家相差甚至不到 0.1 个百分点。另外，由于递进假设考虑了更多经济体，因而基于递进假设我们发现体量较小的资源出口型国家也将受到较大影响。

6. 总结

本文分析了中美可能达成的贸易协定将给其他国家带来的溢出效应。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本文中只关注短期的、直接的出口转移冲击，而不试图分析任何中长期下的一般均衡结果。本文的核心假设是：中国将通过扩大对美进口，并减少其他国家进口的方式，将对美贸易顺差减少至零。考虑到中美贸易协定的具体内容尚未敲定，我们考虑了三种可能的场景。基于这三种假设我们发现，尽管具体的受冲击程度有些许差异，但贸易协定将对其他国家造成负面冲击。而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来说，这种冲击的程度可能较大，并对他们造成可观的经济损失。因此，我们认为中美应当尽快达成结构性的综合协议，支持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避免出口转移对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另外，我们在此对上述三大假设做一些补充声明：我们假设各国间的产品出口是完全替代的，忽略国家间特殊的贸易结构及全球价值链（GVC）等；我们不考虑可能的市场萧条对需求带来的负面冲击，尽管这种场景是很可能发生的；最后，小型资源出口国所受到冲击的具体大小，取决于贸易协定的具体内容，如果协定的影响更多作用于初级产品，则小国受到的影响更大。总的来说，基于现有信息，我们认为这三种假设能够帮助我们充分理解协定的综合影响。

最后，笔者希望再次强调：以上所有分析都仅关注了贸易协定的一个方面，即中国将以扩大进口的方式实现贸易平衡。当然，潜在的协定还可能包含其他条款，如中国可能承诺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这些条款都可能对第三国带来正面或负面的溢出效应。因此，要全面分析协定对世界带来的影响，我们还需要基于进一步信息，进行更细致的综合评估。

本文原题名为“Managed Trade: What Could be Possible Spillover Effects of a Potential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本文作者 Eugenio M Cerutti、Shan Chen、Pragyan Deb、Albe Gjonbalaj、Swarnali A Hannan、Adil Mohommad 就职于 IMF 研究部。本文于 2019 年 11 月刊于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经济被夸大了吗？不应以增值税增长率为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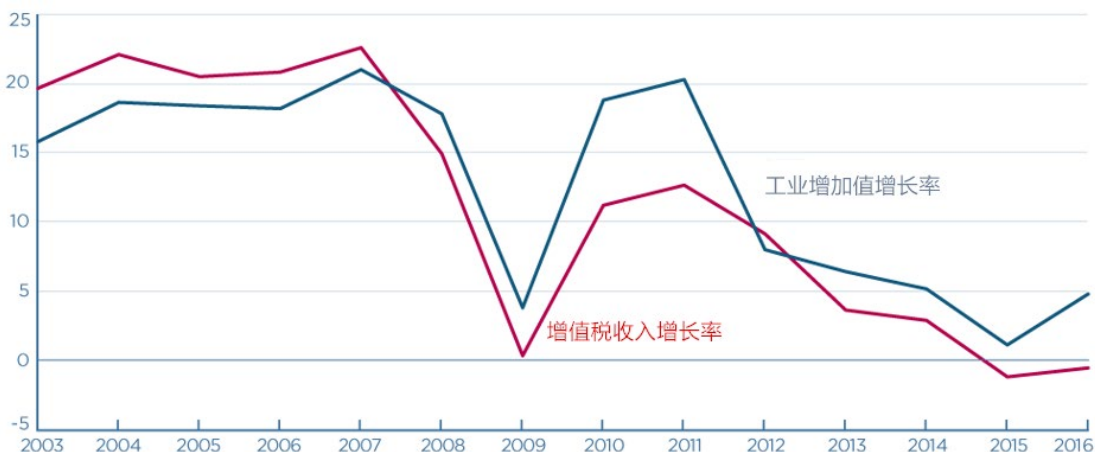
Nicholas R. Lardy & Tianlei Huang / 文 史明睿 / 编译

导读：布鲁金斯学会曾有论文依据中国增值税增速与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差距，判定官方公布的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存在夸大，夸大的原因是地方官员报告过高。但本文认为，增值税增长率需考虑对机械设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值税减免部分，因此原论文依据存在问题。编译如下：

中国经济自 1978 年以来的迅猛发展无疑在近期遭遇了一些问题。一些批评人士多年来一直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被夸大了。这些批评有的指控直接数据造假，有的指控用于解释通胀的价格平减指数存在缺陷。近日，对中国 GDP 统计数据准确性的一项新分析强调了第三个因素：地方官员报告过高。专家们认为，如果地方官员未能实现增长和投资目标，他们的职业生涯就岌岌可危，他们有动机夸大自己的业绩。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发表的这篇论文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官方数据夸大了工业、国内商业和建筑业增加值的增长，2010 至 2016 年间每年夸大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 1.8 个百分点。2010 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征收的工业增值税年均增长率比独立统计部门公布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低 3.7 个百分点，这是该论文依仗的一个论据（见下图）。原作者明确认为税收数据是准确的，并断言官方数据夸大了上述三个部门的增加值增长情况。

自 2010 年起，增值税收入年度增长率低于工业增加值年度增长率 3.7 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税务总局。

比较增值税收入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困难

但是，正如 David Dollar 在该文的评论部分所指出的那样，使用增值税数据可能是不可靠的。因为在某些出口加工地区（尤其是深圳），工业部门的增值税

不对进口零部件生产的出口产品征收。与此同时，Dollar 还列举了一些违规行为，比如地方政府定期给陷入困境的地方工业企业免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 2009 年曾宣布这一做法是违法的，但有其他证据表明，地方当局仍在对部分企业给予增值税减免。

怀疑基于工业增加值增长预测经济增长不准确的最重要原因是，增值税征收方法曾在 2009 年进行过调整。调整后，企业能够通过从增值税中扣除其购买某些投资货物（即机械和设备）所含的增值税，以此减轻企业税负负担。这项改革旨在降低经济表现不佳地区的资本收购成本，最初于 2004 试行，后来于 2007 由财政部扩大执行，2009 适用于所有工业部门和所有省份。

下表中显示，2009 至 2016 年间，平均每年全国机械设备投资增长 14%，工业增加值增长 9%。如果企业需要减免此类投资中的增值税，减免额也将以每年 14% 的速度增长，并可以拉近税务部门征收增值税（第 4 列中的假设值）增长率与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增值税增长率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差距的替代计算：假定增值税扣除

年份	投入		增值税		产出
	机械设备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	嵌入（允许减免）	实际增值税	假定增值税	工业增加值
亿元					
2009	33,205	4,825	14,699	19,524	135,240
2010	40,421	5,873	16,350	22,223	160,722
2011	51,055	7,418	18,425	25,843	193,400
2012	60,045	8,724	20,114	28,838	208,906
2013	70,381	10,226	20,848	31,074	222,337
2014	76,276	11,083	21,451	32,534	233,856
2015	82,518	11,990	21,198	33,188	236,506
2016	82,923	12,049	21,083	33,132	247,878
2010-16 年均增长率	14.0	14.0	5.3	7.8	9.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税务总局，作者计算。

如果减免企业部门投资中的增值税，那么国家增值税增长率与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就会扩大

原文中作者的方法是假设工业增加值增长与增值税增长之间 3.7 个百分点的差距是由地方当局操纵数据造成的。然而，如果企业能够获得机械和设备投资中的增值税减免（如上表第 2 列所示），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假定增值税（实际增值税加上增值税扣除额的总和）将增长 7.8%，这一数字仅比官方公布的工业增加值增速低 1.2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原作者的方法可能把增值税增速与工业增加值增速之间的差距夸大了 3 倍（ $=3.7/1.2$ ）。由于原作者估计，中国 GDP 增长的夸大部分约有 60% 来自工业，考虑到本文中提到的购进机械设备增值税的可抵扣性，原作者认为对中国 GDP 年增长率的高估值应从 1.8 个百分点降至 1 个百分点。

众所周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FAI）额存在夸大，高于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额。在 2004 年之前，这两项指标是接近的，但 2004 年之后差距迅速扩大。从 2017 年开始，政府对固定资产投资虚假报道的打击导致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低于资本形成额的增长。这一政府行为中潜藏的动机可能是为了减少机械设备投资支出虚报中的逃税现象。

综上所述，增值税的增长率也许并不能很好地代表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中国的统计数据可能夸大了增长，但增值税收入增速与工业增加值增速之间的差异提供不了确定的证据。

本文原题为“Is China's Growth Overstated? Don't Rely on Lower Tax Revenue Growth as Evidence”。本文作者 Nicholas R. Lardy 是 PIIE 国际经济研究所安东尼·所罗门的高级研究员，黄天雷是 PIIE 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分析师。本文于 2019 年 11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生男生女与农村劳动力供给

Shing-Yi Wang /文 李芳菲/编译

导读：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妇女在生完女儿之后的一年中劳动力供应下降，此后逐渐恢复至女儿出生前的劳动力供给水平；而生育儿子带来的农村妇女劳动力供给负面影响则更大，持续时间也将比生育女儿更多四年。编译如下：

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妇女在生完女儿之后的一年中劳动力供应下降，此后才逐渐恢复到女儿出生前的劳动力供给水平；而生育儿子带来的农村妇女劳动力供给负面影响则更大，持续时间将比生育女儿更多出四年时间。此外，相比于生下女儿，生育儿子的家庭香烟消费量减少，母亲的闲暇时间、上学的可能性以及参与家庭决策的可能性增加则更为显著。以上结果与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母亲因为生育男孩儿得到相应的奖励，使得她们能享有更多的闲暇和更少的工作。

女性劳动力的参与被认为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许多经济学文献侧重于旨在增加女性劳动力的政策与发展研究（Jensen, 2012; Heath 和 Mobarak, 2015; Goldin 和 Katz 2000, 2002; Bailey, 2006）。然而，数据表明，在印度（Afridi, Dinkelman 和 Mahajan, 2018; Fletcher, Pande 和 Moore 2017）和中国（Wang, 2019）等国家，经济上行期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反而有所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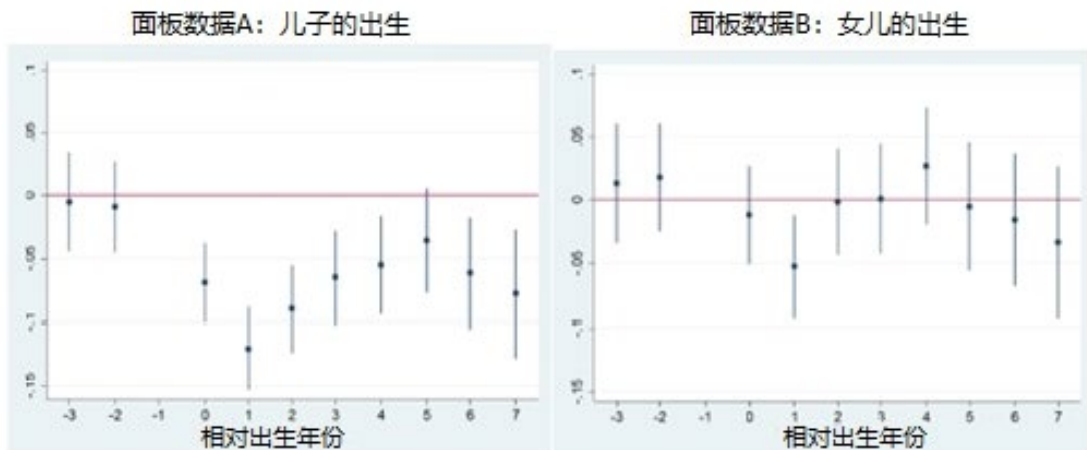
本文研究了生男生女对中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鉴于中国近期的生育率变化，并引发生性性别比改变的这一意外情况，当前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政策的制定将至关重要。本文的研究表明，孩子的性别对女性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果有很大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对象大多从事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在探究生男生女对劳动力供应影响的过程中排除了正规部门工作僵化及雇主的劳动力市场歧视因素所产生的的干扰。此外，该研究对象也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劳动力供应的变化探究家庭本身的偏好。

本文通过对同一数据集中各家庭的多年跟踪，研究同一个人在孩子出生前后的变化，并考察了生育儿子和女儿之后的不同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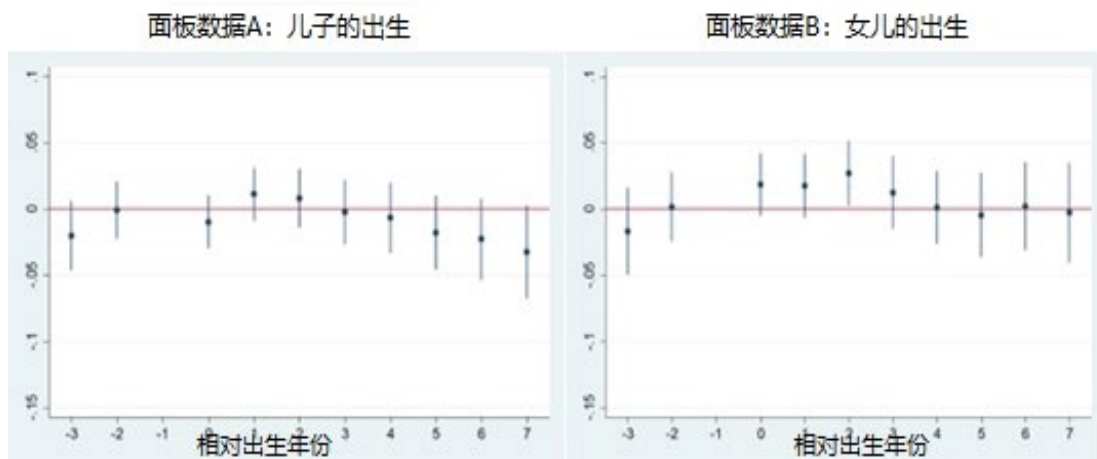
研究表明，在女儿出生后一年以内，女性劳动力供应下降约 5%（见图 1 中的面板数据 B），此后逐渐恢复至出生前水平。而生育儿子则对女性劳动力供给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见图 1 中的面板数据 A），持续时间将延长至 5 年。儿子或女儿出生后，男性的劳动力供给则没有表现出相应减少的迹象（图 2）。

图 1 女性在孩子出生前后几年工作的概率



注释：图中圆点为回归所得系数估计值，其中系数对应出生年份的前一年，线段对置信区间为 95%，对家庭和固定年份所受到的特定影响进行回归，估计值集中在家庭一级。样本大小为 18,144。

图 2 男性在孩子出生前后几年工作的概率



注释：图中原点为回归所得系数估计值，其中系数对应出生年份的前一年，线段置信区间为 95%，对家庭和固定年份所受到的特定影响进行回归，估计值集中在家庭一级。样本大小为 20,131。

本次研究所要解决的下一个问题是，这种针对女性的特定影响模式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有多种可能的解释，例如，或许是受到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影响，部分家庭可能认为男孩的投资回报率要高于女孩。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可能会选择更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选择在早期回归家庭与儿子度过美好的童年时光。

本文还综合考虑了有助于对生男生女给女性劳动力供给带来的影响差异做出解释的其他统计结果。研究发现，相对于女儿，生育儿子将更多地呈现如下结果：家庭香烟消费量降低，学龄母亲继续上学的可能性增加，母亲的闲暇时间增加、受教育机会增加，家庭耐用品采购决策度上升。而在对生男生女对其他方面

投资的影响研究中，我们则发现，对于包括母乳喂养、免疫接种等在内的子女其他投资方面，统计结果在孩子的性别方面没有表现出差异的存在。

考虑到以上结果，由于所研究的家庭中并没有在母乳喂养和免疫方面进行其他可衡量的投资，当前没有证据可以表明需要在儿子身上给予比女儿更多的资金与时间投入。因此，最为合理的解释也许是，在中国农村，女性因生育男孩而获得奖励，因此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降低了田间工作时间。一般而言，女性更倾向于厌恶吸烟，因此，在女性生育儿子之后，家庭香烟消费量也有所减少。

因此，该研究做出了如下的估计：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的性别比例模式与女性劳动力参与之间存在着潜在联系；因此，例如增加与孩子有关的罚款等任何影响性别比例的政策变化，都可能对女性劳动力的生产参与产生意料之外的影响。

本文原题为“[What Happens to Rural Labor Supply Following the Birth of a Son or a Daughter?](#)”。Shing-Yi Wang 是沃顿商学院商业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副教授。本文于 2019 年 12 月刊于 VOXChina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金融全球化的总量与分配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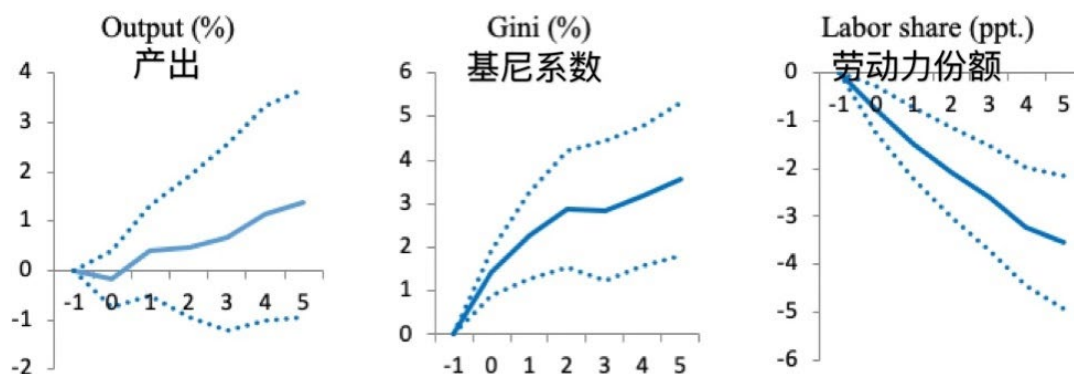
Davide Furceri, Prakash Loungani/文 张子萱/编译

导读：近几十年间的贸易自由使新兴市场国家的国民收入同工业化国家间的差距持续缩小，然而我们目前尚不清楚金融国际化是否也能起到类似作用。研究表明，在实现金融国际化的条件下，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收入增幅较小，但收入贫富差距加剧，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也明显下降。相较于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更难权衡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这也是为了实现全球化包容性大家所须探讨的核心。编译如下：

长期以来，即使是国际贸易的坚定捍卫者，也难免对金融全球化的好处持怀疑态度。罗德里克在 1998 年曾写下著名的一段话：让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无异于让经济受制于“伦敦、法兰克福和纽约那二十多个三十多岁精英们的突发奇想”。曾有人指出，任何证明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的证据都是“绝对脆弱的”，这一观点在随后的研究中也基本得到了证实。本研究测算了 1970-2015 年间国际资本流动对近 150 个国家的影响。并发现，在收入分配方面，金融全球化不会产生明确的“赢家”与“输家”。此外本研究还使用了行业数据，以确定金融全球化对经济整体和各部门的影响机制。

基线效应

我们通过 Chinn-Ito 金融开放指数来观测金融全球化的程度，通过抓取该指数大幅增长时机可以找到资本账户开放的时间。我们共确定了 228 次金融全球化政策，然后追踪基尼系数和劳动力份额来观测产出侧的反应。我们发现，金融自由化对产出的提振是有限的，但却导致了显著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即使在金融自由化五年后，产出的增长仍然很慢。但基尼系数上升了约 4%，这一效应在统计学上和经济上都十分显著，中期内劳动力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了约 4.5%，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影响。



“机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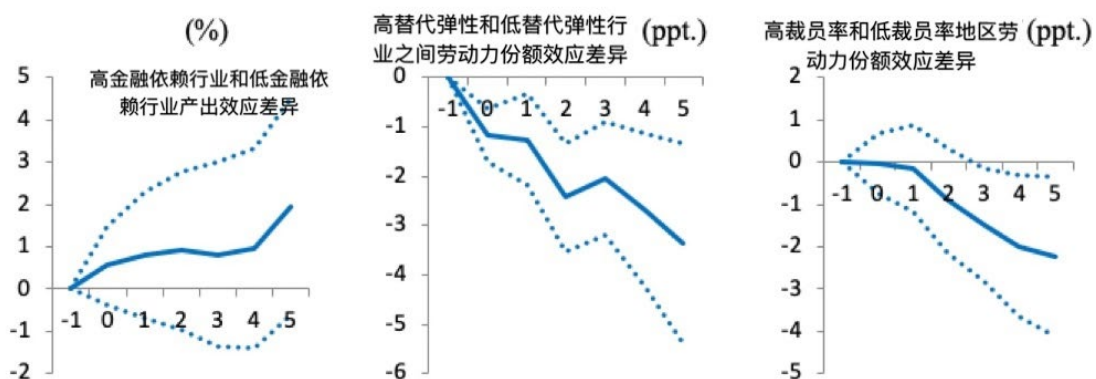
我们通过两个渠道研究了“金融全球化为什么对产出的提振微弱，却能导致

明显的收入不平等”这一问题。首先，金融自由化对本国经济的影响需要通过国内的金融机构，而非直接改善本国借款人的融资环境。在金融发展不完善、包容性较低的地区，金融自由化可能主要改善了第一梯队借款人的融资环境，这可能会进一步抑制产出，并加剧收入不平等的问题。第二，对外资的开放还会带来国内金融市场的波动，这也会对收入分配产生负面影响。自 1980 年以来，50 多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共发生了约 150 次外国资本流入激增，其中约 20% 以金融危机告终。

我们发现，金融自由化后，金融体系完善的国家产出出现增长，但金融体系不完善国家则没有。而且，在金融发展不完善和金融自由化后引发危机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程度更高。要让金融全球化政策能达到提振经济的效果，经济体首先需要满足很多先决条件。就像斯蒂格利茨 2000 年曾警告的那样，如果不考虑经济体所处的环境，盲目的将资本账户自由化等同于“一个装有赛车引擎的旧车，在不检查轮胎的情况下被新手司机开走”。

因果机制

我们也研究了一些因果机制，曾有研究者推测，资本账户自由化将加快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潜在的资本外流会导致工人们的权力受损，劳动要素在生产中占比变小。我们研究了 23 个发达经济体的行业级数据后找到了一些证据来揭示这些因果机制。并发现金融自由化后，与之相关的行业产出的增长很小，但生产活动中劳动要素的份额却出现了显著且持久的下降，而且劳动和资本的替代性越强，劳动份额的下降就越明显，企业应对冲击时的裁员率就越高（表明企业在劳动市场缺乏议价能力）。



展望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相比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可能引发了更多的问题。我们很难说金融全球化是一定有益的，研究结果表明自由的资本流动并未带来平均收入的强劲增长，但却加剧了收入不平等，降低了劳动力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

金融全球化政策能否受到政策制定者的欢迎尚无定论，当前一些发展中经济

体还远未实现全面资本账户自由化。但就这类问题，我们总是有一个常识性的政策处方——资本流动应从有害的方式（特别是与套利交易、资产价格泡沫、信贷繁荣的流动）转向更为稳定的方式（如绿地投资）。此外，要使金融全球化真正发挥作用，一国经济必须具备一些先决条件，如金融包容性以及实体经济对资本流动的弹性。

本文原题为“The aggregate and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financial globalisation”。本文作者 Davide Furceri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部长。Prakash Loungani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独立评价办公室助理主任。本文于 2019 年 12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piie.com/>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EI) 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

简介：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于1943年创立，原名美国企业协会（American Enterprise Association），1962年改为现名。到70年代将其研究的范围扩大，包括政治、经济、外交、防务、能源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大量出版、发行其研究成果，广泛宣传其主张，陆续与三百所大学建立了协作关系，每周举办“公共政策论坛”电视节目，在全国四百个电视台播放，竭力扩大其影响。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为美国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有“保守的布鲁金斯”之称。

网址：<http://www.aei.or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IMF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http://www.imf.org/>